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01期（民國107年9月），1-62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鑄造」疆域：
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藏乾隆時期二匣回疆錢幣研究[*]

賴毓芝[**]

摘　要

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藏有二匣乾隆時期錢幣，收藏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征服回疆後當地所上呈的錢幣。據館方的說法，這兩匣錢幣是 1760-1770 年代乾隆送給凱薩琳女王〔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Catherine II）, 1729-1796〕的外交禮物。兩匣錢幣皆為紫檀木裝，上面刻有漢、滿、蒙、回四體所寫的御製詩，四面並有詞臣的恭和詩，內部則分為三層，一匣裝有三十二枚錢幣，另一匣則有五十一枚錢幣。這些錢幣，除了清代新疆與西藏所流通的錢幣外，還包括中國各代古錢，其時間分佈可以從西元前二世紀到十二世紀，匣內並附有繪有錢幣圖像與說明的圖錄冊頁 。早在 1906 年俄國漢學家 V. Alekseev 就已經注意到這兩匣錢幣，並將此兩者視為一組來介紹。V. Alekseev 的論文並沒有特別著眼於此其清宮脈絡，也沒有提到其與凱薩琳女王的關係，而是將此兩匣錢幣單純地視為研究古代錢幣的材料。饒有興味的是，這兩匣錢幣中並不見任何乾隆將其作為外交禮物的線索，其究竟是否可能是乾隆送給凱薩琳女王的禮物？此篇論文意圖透過清宮豐富的檔案文獻重建乾隆為何要要收藏、裝匣與陳設這些錢幣？其製作的契機與目的為何？更重要的是，文中將此兩匣錢幣同時放在中國與歐洲的脈絡中來分析，試圖說明此兩匣錢幣如何展現清宮對於中國錢幣收藏史之改寫，而此兩匣錢幣所呈現的收藏形式，其非言說的物質與視覺元素，又可能進行什麼樣的文化與政治訊息之論述？

關鍵詞：　清宮視覺文化、清宮錢幣收藏、征服回疆、新疆錢幣改制、清俄關係

---

[*] 此篇文章的完成，特別要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邱士華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麗江兩位同行夥伴協助在無法照相的冬宮博物館內辛苦地抄錄匣盒與匣內冊頁所有的文字內容，也要謝謝 Maria Postarnak 與 Konstantin Kravtsov 兩位錢幣部門研究員的協助申請調件。
收稿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 年 9 月 28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4 年聖彼得堡的冬宮博物館（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推出一個名爲“ДАРЫ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МУ ДВОРУ ЗА 300 ЛЕТ”（Gifts of the East and West to the Imperial Court for 300 Years）的展覽，其中展出一盒紫檀木匣，據館方的說法是 1760-1770 年代乾隆皇帝送給凱薩琳女王〔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Catherine II）, 1729-1796〕的外交禮物（附圖 1）。[1]這個紫檀木匣上面刻有漢、滿、蒙、回四體所寫的御製詩，四面並有詞臣的恭和詩（附錄一），內部則裝有 32 枚錢幣。這些錢幣，除了清代新疆與西藏所流通的錢幣外，還包括中國各代古錢，其時間分布從西元前二世紀到十二世紀，匣內並包括一冊繪有各個錢幣與說明的圖錄冊頁。值得注意的是，冬宮事實上還藏有另一件形式、內容非常類似紫檀木匣（附圖 2），內有 51 枚錢幣，同樣附有圖錄冊頁一冊。早在 1906 年俄國漢學家 V. Alekseev 就已經注意到這兩匣錢幣，並將此兩者視爲一組來介紹。[2]V. Alekseev 的論文並沒有特別著眼於清宮脈絡，也沒有提到兩匣錢幣與凱薩琳女王的關係，而是將其單純地視爲研究古代錢幣的材料。饒有興味的是，這兩匣錢幣中並不見任何乾隆皇帝將其作爲外交禮物的線索，究竟是否可能是乾隆皇帝送給凱薩琳女王的禮物？此篇論文意圖透過清宮豐富的檔案文獻，重建乾隆皇帝爲何要收藏、裝匣與陳設這些錢幣？其製作的契機與目的爲何？更重要的是，將兩匣錢幣同時放在中國與歐洲的脈絡中分析，試圖說明其如何展現清宮對於中國錢幣收藏史之改寫，而此兩匣錢幣所呈現的收藏形式、非言說的物質與視覺元素，又可能進行什麼樣的文化與政治訊息論述？

---

1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ed., *Dary Vostoka i Zapada Imperatorskomu dvoru za 300 let: katalog vystavki* (Gifts from East and West to the Imperial Court over 300 years: exhibition catalogue) (Sankt-Peterburg : Izdatelʹstvo Gosudarstvennogo Ėrmitazha, 2014), pp. 162-163.

2 V. Alekseev, *Numizmaticheskaya Kollektsiya Bogdokhana Tsyan' Luna* (Numismatic Collection of Emperor Qianlong) (St. Petersburg: Printing house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06).

「泉流歸極」錢幣匣的成立

冬宮所收藏的這兩匣錢幣，大小與形制約略相同，第一匣外盒尺寸長與寬皆為 16.5 公分，高為 8.2 公分。匣蓋頂刻有漢、滿、蒙、回四體乾隆御製詩，側面則每一面刻有兩位詞臣的恭和詩文，共八首，其作者分別為錢汝誠、錢維城、梁詩正、劉綸、于敏中、王際華、蔣溥、劉統勳（見附錄一）。內有三木屜，由上而下，各鑲置有錢幣 14 枚、9 枚與 9 枚，總共 32 枚錢幣。三層錢幣上面還放置有一經折裝的冊頁，冊頁木板封面題刻有「泉流歸極」四個字，上並塗繪金彩。第二匣雖然略大，長與寬為 17.5 公分，高則為 8.4 公分，然盒外刻有一樣的御製詩與恭和詩文，內部一樣有三層木屜，兩者為同樣形制。第二匣的第一層有 16 枚錢幣，第二層 16 枚錢幣，第三層 19 枚錢幣，[3]總計 51 枚錢幣。內附冊頁封面則金彩題刻「古蚨遠至」四字。關於這兩盒錢幣的研究，除了上述 1906 年俄國漢學家 V. Alekseev 的論文與展覽圖錄的簡單說明外，[4]幾乎付諸闕如。而 Alekseev 的論文主要從錢幣學的角度出發，重點在介紹乾隆皇帝所收藏的古錢。文中最大的篇幅在於以俄文翻譯及解讀匣盒上的御製詩及冊頁內所載的奏摺內容。然而，對於此兩匣錢幣的製作目的為何？為何要如此慎重地銘刻御製詩？並請群臣恭和？且為何會出現在俄國宮廷的收藏中？卻全然無所涉及。而這些問題的可能解答，還是要回到這兩件作品本身。

面對第一匣錢幣，首先看到的是匣頂的四體御製詩，此御製詩第一段為：

> 天祐西師蕆大功，勞徠泉府貴流通。形猶騰格因其俗，寶鑄乾隆奉我同。

3 據 Alekseev，現存此層少了一枚錢幣，見 V. Alekseev, *Numizmaticheskaya Kollektsiya Bogdokhana Tsyan' Luna* (Numismatic Collection of Emperor Qianlong).

4 Alekseev 的論文轉錄了二盒錢幣內含冊頁所有文字與第一盒外的御製詩，然沒有外盒側八首詞臣的恭和詩，因此，八首恭和詩乃是根據本人於 2017 年 7 月 4 日赴冬宮博物館親自檢視兩盒錢幣所抄錄而來的，見附錄一。

之後則有小字註解：

回城既定，部人以騰格輸賦，將軍等請仍其舊式，惟於陽面加鑄乾隆通寶以行，又驛致回中所有古錢。蓋彼時妻主輸繒所致，因命儒臣排次之。

第二段接著爲：

景德開元溯所有，和親戶市鑑於中。篋藏詎詡聲靈訖，垂示懷柔慎自躬。

最後則小字屬款：

命儒臣排次回部錢文及所有古銅錢，因題以句，乾隆庚辰仲夏御製。

乾隆庚辰爲乾隆二十五年（1760），仲夏爲農曆五月，而檢視乾隆《御製詩集》，也發現此詩編排於有五月十一日紀日款的〈雨〉與五月二十四日的〈復雨〉二詩間，[5]因此應該作於此期間。

「騰格」爲南疆通行的貨幣計量單位，完成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中清楚地提到：「回人稱錢爲雅爾瑪克，以一錢爲一普爾。普爾爲言文也，每一普爾直銀一分。初以五十普爾爲一騰格，後定以百普爾爲一騰格，直銀一兩」，[6]所以一騰格大約等於銀一兩。詩文「部人以騰格輸賦」，所指「騰格」應該是以騰格爲單位通行於回疆的舊錢幣，正像「普爾」一詞一樣，不僅爲回疆貨幣的單位，同時也用來轉指流通於回疆的貨幣。[7]乾嘉年間著名的錢幣學家翁樹培在其《古泉彙考》即提到：「回部錢謂之騰格錢，近人《錢譜》云：即回子錢，形如桃核，面背皆回字，不可識」。[8]這種騰格錢或普爾錢形狀如一小核桃（附圖 3），正面與背面皆有回字，與中原地區的錢幣

5 見〔清〕高宗御製，〈命儒臣排次回部錢文及所有古銅錢因題以句〉，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 1305，卷 5，頁 350；〔清〕高宗御製，〈雨〉，《御製詩三集》，卷 5，頁 349；〔清〕高宗御製，〈復雨〉，《御製詩三集》，卷 5，頁 350。

6 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卷 35，頁 479。

7 關於回疆普爾錢的鑄造，見堀直，〈清代回疆の貨幣制度──普爾鋳造制について〉，《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開明堂，1980），上卷，頁 581-602。

8 〔清〕翁樹培，《古泉彙考》，下冊，重印於《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匯刊》（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4），頁 1474。

最大的差別在於，除了使用純銅，不摻鋅、錫外，不同於中國貨幣通常以澆鑄法製成，[9]舊的騰格錢或普爾錢則是以源自西方傳統的打壓法製成，通常沒有穿孔，[10]因此翁樹培還引《元詩選》中耶律楚材所集〈西域河中十詠詩〉「難穿無眼錢」句，其註曰：「其金銅芽錢無孔郭」，[11]來說明回疆騰格錢的這一特色。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平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亂，天山南北路西域全部底定，錢法的改制爲乾隆皇帝在回疆進行統治最先著手的幾個重要政策之一。最早可以推到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定邊將軍兆惠剛剛平定喀什噶爾等二城，兆惠即就喀什噶爾設官定職、徵糧、鑄錢、及駐兵分防各事宜上奏乾隆皇帝。我們目前沒有找到兆惠的原摺，但是根據《清實錄》，我們知道兆惠就回部鑄錢提出兩個方案：

> 回部錢文，應行改鑄。查回錢俱紅銅鼓鑄，計重二錢，一面鑄準噶爾台吉之名，一面鑄回字。因所產銅少，每以新錢一文，易舊錢二文，銷毀更鑄。今雖未便全收改鑄，現有鑄礮銅七千餘觔，請先鑄錢五十餘萬文，換回舊錢另鑄。或照內地制錢，每一文重一錢二分，或即照回錢體質，一面鑄乾隆通寶漢字，一面鑄葉爾羌清文及回字，並呈樣請旨酌定。[12]

兆惠認爲「回部錢文，應行改鑄」，因爲他調查得知，回錢都是以紅銅鼓鑄，大約重兩錢，一面鑄以準噶爾台吉之名，一面鑄回字。而根據《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所載：「準噶爾部，舊徵回部普爾，即以回部所輸普爾錢文資用。凡台吉新立，則於錢面易名改鑄。其法先鑄新錢一萬換易舊錢，新者以一當二，旋換旋鑄，舊錢銷盡乃已。」[13]亦即回疆的舊俗，新的統治者上臺就會以新的統治者名號改鑄新錢文。實際執行的方法爲先鑄新錢一萬，然後採用兩舊錢換

---

9 David Hartill, "Casting Methods," *Qing Cash* (London: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2003), pp. 21-26.

10 見劉燕、穆淵，〈試論清代新疆銅錢〉，《新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30 期 2（2002 年 6 月），頁 71。

11 〔清〕翁樹培，《古泉彙考》，下冊，重印於《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匯刊》，頁 1474。

12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593，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庚午，頁 599。

13 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卷 35，頁 480。

一新錢的方式，回收舊錢，再以回收之舊錢立即改鑄新錢，如此慢慢把舊錢汰換銷盡。所以兆惠也擬用此慣例，他提議先將舊有砲銅七千餘斤，鑄錢五十餘萬文，然後換回舊錢，再行新鑄。然而問題是，究竟要鑄造什麼樣的新錢幣？兆惠提議了兩個方案，一爲比照內地鑄造制錢，每一文重一錢二分，另一則爲「照回錢體質，一面鑄乾隆通寶漢字，一面鑄葉爾羌清文及回字」，[14]兆惠並就後者製樣說明。什麼是「回錢體質」？如果只是「一面鑄乾隆通寶漢字，一面鑄葉爾羌清文及回字」，與內地制錢的規制（正面用清朝年號，背面爲鑄錢局名）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事實上，俗稱紅錢的新普爾錢與舊回錢（亦即準噶爾普爾錢）在質地（均爲紅銅）、重量（均爲二錢）、市値（均爲五十文合銀一兩）都是相同的，[15]此應即兆惠所謂「回錢體質」。然此新回錢（附圖 4）畢竟還是與舊回錢不同，而帶有許多制錢的色彩，例如其圓形方孔的樣式、正面清朝年號與背面鑄錢局名的規制、及採用澆鑄的技術等，都與內地制錢相同，[16]因此王永生即認爲此新鑄的紅錢「已基本納入了內地的制錢體系，但仍保留了濃郁的地域性及民族性」，[17]此一結論正是《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所言「今回部既入版圖，從各省之例，附彼處城名於其幕，而正面遵用天朝年號，以彰同文之治。幕文兼用回字者，從其俗也」的翻版。[18]對於兆惠的提案，乾隆皇帝回覆了「俱著照所請行」六字，並指示「所呈錢文已交錢局鑄造二百文，發往爲式，即用該處工役鼓鑄」。[19]乾隆皇帝顯然是採取了第二個方案，並將兆惠所呈樣的錢文發給錢局鑄造二百文，以此爲範式發往回疆，雇用當地的工匠生產。葉爾羌鑄錢局因而於乾隆二十五年設立，爲新疆最早的鑄錢局。

---

14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93，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頁 599。

15 此根據王永生之整理，見王永生，〈葉爾羌局〉，《錢幣與西域歷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25。

16 關於清代的制錢，見王德泰，《清代前期錢幣制度型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David Hartill, *Qing Cash*.

17 王永生，〈葉爾羌局〉，《錢幣與西域歷史研究》，頁 226。

18 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卷 35，頁 479。

19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93，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頁 600。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回疆原來製幣的傳統爲源自西方的打壓法，當地工匠如何能勝任依據宮中所發來的樣錢製作新錢呢？王永生引用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軍機處錄副奏摺，認爲清政府轉命陝西巡撫從寶陝局派員前去支援。寶陝局工匠攜帶鑄錢所需成套器具兩副，三月中旬從西安出發，歷時五個多月，於八月始抵葉爾羌，九月即開爐鑄錢。[20]乾隆皇帝非常關切據宮中發來樣錢在地方新鑄錢文的樣貌，早在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一日即下旨阿克蘇辦事大臣舒赫德，希望可以看到成品。[21]這些往來的公文俱以滿文寫成，由往來的內容與頻率可以看到，清作爲一個帝國如何非常有效率地調度內部的資源以達到一定程度的標準化管理。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阿克蘇辦事大臣舒赫德收到乾隆皇帝四月初一所送出的上諭：「乘便寄諭舒赫德等，去年送去回子地方鑄錢式樣，思此期間，在彼處業已照式鑄造使用。舒赫德等奉到上諭後，將照式鑄造的錢文挑選幾枚，令順便解送。欽此」，[22]乾隆皇帝認爲去年已經送去樣錢，現今地方應該早已經照式製作並已經開始使用，因此要求舒赫德揀選幾件呈覽。殊不知此新鑄錢幣牽涉到技術的移轉，並沒有像乾隆皇帝想的快速，因此舒赫德收到此上諭後，於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回覆道：「查得從內地派出鑄錢匠役等，經吳達善咨報飭令同知坤豫於三月十一日自肅州起程前來，尚未抵達，俟到達後即令鼓鑄，酌將鑄得錢文先行挑選數枚，恭呈御覽」，[23]舒赫德從陝甘總督事務巡撫吳達善處得知，同知坤豫帶內地鑄錢匠役於三月十一日自肅州啓

20 見王永生，〈葉爾羌局〉，《錢幣與西域歷史研究》，頁 220，註 4。

21 見〈阿克蘇辦事大臣舒赫德奏遵旨將所鑄錢幣呈覽摺〉（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收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冊 45，頁 263-264；〈駐葉爾羌辦事侍郎海明等奏在回疆所鑄錢樣送往京城摺〉（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5，頁 312-313。

22 此中文翻譯自原爲滿文的〈阿克蘇辦事大臣舒赫德奏遵旨將所鑄錢幣呈覽摺〉（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5，頁 263-264。此〈阿克蘇辦事大臣舒赫德奏遵旨將所鑄錢幣呈覽摺〉標題並不精確，事實上舒赫德表示工匠還沒到，故還沒開始鼓鑄，待開鑄有成品，會立即上呈，所以並非在此摺呈覽。

23 〈阿克蘇辦事大臣舒赫德奏遵旨將所鑄錢幣呈覽摺〉（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5，頁 263-264。

程，還沒到達，並答應乾隆皇帝，等開始鼓鑄後，會將鑄得錢文恭呈御覽。乾隆皇帝於同月的二十九日硃批諭旨「知道了」。舒赫德並將同一上諭轉給駐守在葉爾羌的海明、額敏和卓，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海明、額敏和卓馬上奏報乾隆皇帝，並提供更多細節：

> 據辦理陝甘總督事務巡撫吳達善咨稱，派往葉爾奇木辦理鼓鑄錢文事務之漢中府同知坤豫，帶領匠役宰有等八名，於本年三月十一日自肅州起程前往葉爾奇木等情，咨報前來。今尚未到葉爾奇木，俟同知坤豫抵達葉爾奇木鼓鑄錢文完竣，奴才欽遵上諭挑選所鑄錢文數枚，乘便解送京城，進呈御覽。仍咨庫車、哈喇沙爾大臣，催令同知坤豫速赴葉爾奇木等因，謹具奏聞。[24]

根據奏文，我們知道派往葉爾奇木辦理鼓鑄錢文事務之漢中府同知坤豫帶了八名匠役於三月十一日啓程前往葉爾奇木，然迄五月尚未到達，海明、額敏和卓並去文庫車、哈喇沙爾大臣，催促坤豫，並了解尚未到達的原因。乾隆皇帝很有效率地於六月初九日硃批：「知道了。」之後坤豫顯然又花了三個月，最後終於在八月始到達葉爾羌，九月才開爐鑄錢。總之，回疆新普爾錢的鑄造採用原來舊普爾錢的材料（紅銅），但是爲了符合清帝國標準化制錢的形式（外圓內方孔），原來地方打壓法的技術顯然難以勝任，必須採用新的澆鑄法，因而仰賴寶陝局工匠的支援，學者因而認爲乾隆朝葉爾羌局所鑄紅錢有非常清楚的寶陝局特色，尤其在正面乾隆通寶的字體與風格上，非常接近同時期寶陝局的產品。[25]

回到乾隆皇帝的御製詩，乾隆皇帝於二十五年四月一日發出上諭，要求將前一年已經命宮中送出樣錢的新鑄普爾錢上呈御覽，五月間公文往返，他才了解到新鑄錢幣的進度因爲陝中工匠遲遲未到，根本還沒有開鑄，換句話說，其寫作御製詩的乾隆二十五年五月，新的普爾錢根本還不見蹤跡，因此御製詩所

24 〈駐葉爾羌辦事侍郎海明等奏在回疆所鑄錢樣送往京城摺〉（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5，頁 312-313。

25 王永生，〈葉爾羌局〉，《錢幣與西域歷史研究》，頁 220。

「命儒臣排次回部錢文」之「回部錢文」，指的是舊的核桃狀普爾錢與流通在回疆的中國古錢。詩的註文特別提到「將軍等請仍其舊式，惟於陽面加鑄乾隆通寶以行」一事，此將軍當然就是定邊將軍兆惠，而其「舊式」應該只是指舊的質地、重量與市值，而其「加鑄乾隆通寶」的形式已經完全是內地制錢的規制。

有趣的是，註文還特別提到，驛站所送回來的古錢，乃是「彼時妻主輸繒所致」。此「妻主輸繒」究竟所言何事？下一段詩文一開始即言「景德開元溯所有，和親戶市鑑於中」，而匣側面的于敏中的恭和詩中更有「輸繒往事嗤唐宋，今日纏頭盡鞠躬」一句，[26]因此此「妻主輸繒」指的應該是唐宋時所採取的和親與歲輸繒帛來維持兩造和平的政策，于敏中詩中因此訕笑唐宋委屈求和的往事，以之對比當下回人鞠躬求和之姿所呈現的大清盛世。令人感到興味的是，清廷事實上也以公主下嫁邊疆民族，尤其滿蒙聯姻一直是清廷的重要政策，[27]然而相較於對唐宋和親的不屑，乾隆皇帝卻是非常讚揚滿蒙聯姻，認爲「塞牧雖稱遠，姻盟向最親」。[28]對乾隆皇帝而言，「如漢唐宋明，和親稱姪，歲幣屢增，是亦遜讓之極矣」，[29]而其對外政策再三強調「駕馭外藩之道，德威宜於並用」，[30]因此，委曲求全的「和親」是完全無法與德威並用的滿蒙「姻盟」相提並論的。

檢視盒中收藏錢幣，以第一屜爲例，除了 5 枚舊普爾錢外，接著就是 9 枚中國錢幣，分別爲 3 枚唐高祖「開元通寶」錢，兩枚宋眞宗「景德」錢，兩枚宋眞宗「祥符」錢，一枚宋眞宗「天禧」錢，一枚宋仁宗篆書「天聖」錢，

26 木匣側邊所刻于敏中原詩爲：「洱海銘垂底定功，旋收普爾致和通。旁行略比三銖小，圜法全歸九府同。遠共飛蚨來徹外，都成編貝入函中。輸繒往事嗤唐宋，今日纏頭盡鞠躬。臣于敏中恭和。二印『臣』『中』。」

27 見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8 張穆，〈內蒙古哲里木盟游牧所在 · 科爾沁部〉，《蒙古游牧記》（臺北：蒙藏委員會，1980），卷 1，頁 2。

29 這是關於對準噶爾用兵，原被指派爲定邊左副將軍的原蒙古厄魯特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叛逃入俄羅斯，乾隆皇帝強力要求俄羅斯交出人所發的〈上諭〉，見〈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冊 3，頁 136-137。

30 見〈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王大臣等面奉上諭〉，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冊 3，頁 141。

這些錢幣的組合即是詩中所指「景德開元」，乾隆皇帝認爲應回溯這些錢幣之所由的「和親戶市」爲鑑，最後詩文以「篋藏詎詡聲靈訖，垂示懷柔愼自躬」作結，說明其命裝匣收存並非爲了在神祇前自誇，而是爲了謹愼自省以表懷柔之姿。

乾隆皇帝意欲以錢幣「鑑／見」史的意圖，可以在此匣錢幣所附冊頁中文字與其編排進一步得到說明。此冊頁共有十開，上下以木板爲封面，木板封面刻有「泉流歸極」四字，並以金彩填繪。第一開以左右圓光各寫「泉」、「流」兩字，第二開以同樣格式寫「歸」、「極」二字，左頁左下並有印二枚「幾暇臨池」、「乾隆宸翰」兩方乾隆皇帝御印，此應爲乾隆皇帝御筆。第三開左頁滿文，右頁漢文，錄副將軍富德所上呈之奏摺：

> 副將軍臣富德等謹奏：臣等收服回部，至和闐經理諸務，查詢回人行使之普爾銅錢，每五十枚為一騰格，每一騰格抵中國銀一兩。謹將普爾錢文選擇數枚呈覽。又回人處有唐宋時錢，今擇其字畫可識者，一併附呈御覽，為此謹奏。[31]

富德爲滿州正黃旗人，[32]乾隆十三年（1748）曾經從傅恆征金川，乾隆二十年（1755）參與出師準噶爾，乾隆二十二年（1757）輔佐兆惠追捕叛逃入俄羅斯的阿睦爾撒納。乾隆二十四年兆惠被命爲定邊將軍負責進入回部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受困於呼爾璊，富德被命爲定邊右副將軍赴援，而有之後的呼爾璊大捷，[33]因此，富德可說是實際參與平定回部的最主要功臣之一。由其奏摺，我們知道盒中的普爾錢與唐宋時錢乃是富德從其平定區域的回人所得，並隨奏摺上呈給乾隆皇帝。

31　第一匣內《泉流歸極》冊頁，第三開右頁。

32　關於富德生平，見〔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314，列傳 101，富德，頁 10702-10704。

33　關於戰事的細節，見〔清〕昭槤，〈平定回部本末〉，《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6，頁 148-153；〔清〕傅恆等編，〈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疏奏大敗賊眾於呼爾璊〉（乾隆二十四年二月甲子），《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 68，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59，頁 236-240。

在圖繪錢幣的第四、五開與第六開右頁後，第六開左頁開始爲滿漢大臣與乾隆皇帝同觀後，對此批錢幣的追本溯源與詮釋。其文爲：

> 乾隆二十有四年歲在己卯，西師藏事大功告成，諸回部相率內屬，將軍等稱詔撫定，庶務畢舉，奏請改鑄錢文，虔奉天朝年號。今副將軍富德以其舊行之普爾錢及彼中所有唐宋時錢二十七品附章以進。臣等謹按：回紇花門唐時始通中國，而于闐黑韓王則自宋建隆至宣和亦數有信使往來，其初唐及北宋諸錢，蓋市易懋遷，遂爾流播，初非列版圖而通泉貨也。以視今日德威遐暨，纏頭冒耏之輩，咸競競奉尺一為臣僕，而革彼舊俗，煥我同文，九府圜法且流行至二萬餘里。猗歟盛哉！稽之往牒，實罕倫比。[34]
>
> 臣等奉敕排次，捧觀忻忭，爰請匣藏之，用昭我大清一統之盛，垂示久遠云。己卯長至月（農曆五月）臣蔣溥，臣劉統勳，臣梁詩正，臣劉綸，臣董邦達，臣裘曰修，臣于敏中，臣介福，臣金德瑛，臣觀保，臣錢汝誠，臣王際華，臣錢維城恭識。二印「報國文章」「臣敏中印」。[35]

乾隆二十四年，也就是在乾隆皇帝寫作御製詩的前一年，回部藏區納入版圖，在兆惠的建議下，改鑄此區域流通錢幣之錢文，以奉天朝年號。文中並提到富德隨其奏摺進呈了 27 枚錢幣，除了「唐宋時錢」外，不出前論所推，所附的正是「舊行之普爾錢」。群臣考其淵源，認爲唐代即與回紇有所往來，于闐黑韓王與宋朝也有外交關係，所以此地發現的唐宋錢幣，應該是「市易懋遷，遂爾流播」的結果，認爲此區域「初非列版圖而通泉貨也」，雖然以前並非中國的疆域，卻已流通中國的貨幣。群臣接著主張當今皇帝德威遠播，這些纏頭蓄鬚之輩紛紛甘願爲皇詔之臣僕，「革彼舊俗，煥我同文，九府圜法且流行至二萬餘里，猗歟盛哉」，清朝之貨幣制度因而甚至流播至二萬多里之外，讓人不禁讚嘆國朝之盛，乃以往紀錄無可比擬的現象。最後，群臣表示在皇帝命令

34 《泉流歸極》冊頁，第六開左頁－第七開右頁。
35 《泉流歸極》冊頁，第七開左頁。

下一一捧觀這些錢幣，因此建議將其裝匣保存，用以「昭我大清一統之盛，垂示久遠云」。後面並列了滿漢十三位大臣的署款，除了介福與觀保外，其餘皆爲乾隆朝最重要的漢詞臣文膽。令人不解的是，《清實錄》記錄將軍兆惠所提議的錢法改革爲乾隆二十四年七月，然上述乾隆二十四年五月的群臣記事文卻早已提到兆惠「奏請改鑄錢文，虔奉天朝年號」一事。但是不管如何，乾隆皇帝卻一直到隔年五月才寫作御製詩，因此匣側的群臣唱和詩也應該在此時，且不是所有前一年觀看錢幣的大臣們都參與，而是僅有蔣溥、劉統勳、梁詩正、劉綸、于敏中、錢汝誠、王際華、錢維城八人。

「泉流歸極」錢幣匣內含實際參與戰事將軍上呈之奏摺、由地方回人處得來之錢幣實物、大臣們共同捧觀錢幣而寫下一手見證、事後乾隆皇帝的御製詩與群臣的唱和詩，此「紀錄」由一手、二手的不同形式與不同時間點的材料組合而成，特別是藉由直接展示或抄錄一手材料，例如，盒裝由回人處得來之錢幣實體、抄錄參與戰事之將軍的一手報告、群臣的捧觀紀錄等，使得此紀錄所呈現的「歷史」事件有一種近乎目擊且可觸摸的實體感。有趣的是，這些看似一手報告、或甚至深具臨場感的詩詞唱和，卻很可能經過非常精心刻意的裁剪而呈現出來的。例如，以木匣外盒的八首群臣唱和詩爲例，幾乎都未見於各署名大臣的文集中。僅有匣上原署名「錢汝誠」的唱和詩，卻出現在錢維城的文集中。盒上錢汝誠原詩爲：

> 西戎即敘奏殊功，鹽澤泉源玉府通。絕域貿遷徵品異，皇朝正朔表文同。流傳漫紀漢宋唐，則壤仍分上下中。再譜《西清錢錄》後，遐哉聲教仰宸躬。臣錢汝誠恭和。二印「臣」「誠」。[36]

此詩出現在錢維城《鳴春小草》的版本爲：

> 西戎即敘奏殊功，鹽澤泉源玉府通。絕域貿遷徵品異（洪遵《泉志》有異品錢），皇朝正朔表文同（回人以騰格輸賦每一騰格直白金一兩，上命仍其舊製，惟于陽面加鑄「乾隆通寶」四字）。流傳漫紀漢宋唐

36　第一匣木盒外側群臣恭賀詩，見附錄一。

（其古錢自五銖起至元尊寧止），則壤仍分上下中（其葡萄園等輸賦，各分等次，詳見將軍原奏中）。直過天山開鼓鑄，遐哉聲教溯宸躬。[37]

文中劃線的部分爲與盒外詩文不同之處。前首詩文的版本，除了無括號中的小字註解，與將最後一句「遐哉聲教溯宸躬」中的「溯」改爲「仰」字外，最大的差別爲將「直過天山開鼓鑄」一句，以「再譜《西清錢錄》後」取代之。由於錢氏文集的出版爲乾隆四十年，我們無法判斷兩者的不同究竟是和詩在前，錢氏文集出版時再行修改，還是錢氏文集所錄者爲當時錢氏原詩，而匣上的和詩爲皇家修訂的版本？但是不管如何，匣上強調的是其對乾隆十五年（1750）宮廷編纂《錢錄》的承續。另一個令人困惑的是，爲何出現在錢維城詩集的詩作卻落錢汝誠款？這樣例子在清宮似乎並不罕見，例如，記載宮中各式工坊每日交辦事務與工作內容的《內務府造辦處各處成做活計清檔》（之後簡稱《活計檔》）中乾隆三年（1738）五月初二日的「裱作」就記載「令唐岱落郎世寧款」，[38]或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初三「如意館」也記載「沈源用絹畫賜宴圖手卷一卷，畫得時請旨應落何人款？……張雨森的，欽此」等，[39]詞臣與宮廷畫家處境可能類似，畫作與詩作究竟落誰的款，並不一定與實際的生產或創作者有關，往往決定於皇帝的旨意。然此旨意的用意爲何？恐怕得依據不同案例細細推敲。就錢匣的例子而言，根據錢維城的文集判斷，其原詩應是錢維城所作，然究竟是錢維城私下爲錢汝城代筆？或奉旨落錢汝城款？我們不得而知。然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有異名或代筆的可能，此詩應該不是單純地記錄當場的唱和。另一個可以說明此匣所呈現的意象是經過如何高度控制與策劃的例子，是富德的奏文。

---

37 〔清〕錢維城，《鳴春小草》，卷五，頁 10 上-下，出自《錢文敏公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冊 346，頁 416。

3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裱作〉，乾隆三年（1738）五月初二日，冊 8，頁 182。

3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如意館〉，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初三日，冊 15，頁 345-346。

我們並沒有發現匣內冊頁中所抄錄富德奏摺的漢文原件，考慮乾隆朝新疆相關檔案幾乎都是以滿文寫作，富德於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所上之滿文奏摺，是目前僅見的滿文檔案，內容與盒中冊頁所抄錄奏摺非常相似，卻又不完全一致，其漢文翻譯如下：

> 奴才等抵達和闐，自回子等拿到唐朝、宋朝舊錢二三十枚，挑選其中尚能辨識字跡者呈覽外，現今回子地方使用普爾銅錢，五十普爾為一騰格，一騰格即兌換我們銀一兩，相應挑選普爾錢數枚，一併包封進呈，恭請皇上睿鑒。
>
> 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初一日，奉硃批諭旨：知道了。欽此。[40]

此滿文奏摺與冊頁抄錄奏摺內容雖然幾乎一致，但行文的順序前後對調，且多了指陳錢幣數量的細節（「唐朝、宋朝舊錢二三十枚」）。由內容如此高度重疊看來，且考慮富德應該沒有理由爲同一件事情上兩次奏摺，因此此滿文奏摺很可能是冊頁所抄錄奏摺的原摺。有趣的是，如果我們的推論正確，爲何「泉流歸極」中的富德原摺要經過重新安排編輯？特別是爲何要把原摺中關於數量的部分剪裁掉，且在原來「唐朝、宋朝舊錢二三十枚」僅選擇「唐宋時錢二十七品」？[41]

檢視《活計檔》，發現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匣裱作」記載：

> 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交：
>
> 古錢二十七個、回子錢三個（小字：隨錢譜樣一件），傳旨：著照錢譜上回子錢樣式鑄造二個，得時按譜配匣盛裝，欽此。[42]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正是在乾隆皇帝寫作〈命儒臣排次回部錢文及所有古銅錢，因題以句〉御製詩的時間，[43]那天太監胡世傑交上古錢 27 枚與 3 枚回

40 〈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奏將和田回子所用普爾錢選送呈覽片〉（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38，頁 326。

41 見《泉流歸極》冊頁，第六開左頁。

42 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匣裱作〉，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冊 25，頁 158。

43 正如前論，此詩應該作於有五月十一日紀日款的〈雨〉一詩與五月二十四日的〈復雨〉間。

子錢，並同時附隨一份錢譜樣稿。由於「隨錢譜樣一件」爲小字註解置於「回子錢三個」後面，因此此「錢譜樣」很可能是根據 3 個回子錢所作的樣張。「古錢二十七個」雖然與第一盒錢幣內「唐宋時錢二十七品」符合，然交來的回子錢卻只有 3 枚。令人驚訝的是，乾隆皇帝命工匠就 3 個回子錢繪製樣稿，再新製兩枚回子錢，而 3 枚原來的回子錢，再加上 2 枚宮中仿鑄的回子錢，剛好就是第一盒內 5 個舊普爾錢的數量。同一個月的月底，我們看到另外兩條記載：

> 於本月二十六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添做得回子錢二個並錢譜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錢譜上回子錢樣著如意館另画，配匣盛裝。欽此。
>
> 於本月二十九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回子錢二個，傳旨：著歸入配匣回子錢三個內，配匣盛裝，其新做回子錢二個持出。欽此。[44]

雖然十一日乾隆皇帝已經下令將新鑄普爾錢並「按譜配匣盛裝」，但此任務到二十六日才完成，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此時才「添做得回子錢二個並錢譜持進」，乾隆皇帝並依照之前指示「按譜配匣盛裝」，更具體交代「將錢譜上回子錢樣著如意館另畫，配匣盛裝」。三天後，也就是二十九日，太監胡世傑所交的「回子錢二個」，乾隆皇帝馬上命「著歸入配匣回子錢三個內，配匣盛裝，其新做回子錢二個持出」。不知道太監胡世傑所交的「回子錢二個」究竟是舊普爾錢？還是宮中新鑄的普爾錢？但是由最後一句「其新做回子錢二個持出」判斷，此二個普爾錢很可能是某處後補來的舊普爾錢。換句話說，最後錢匣內應有古錢 27 枚，原來 3 枚回子錢，再加上以後補 2 枚回子錢取代之前清宮仿鑄的普爾錢，全數應有 32 枚錢幣，剛好爲冬宮藏第一匣錢幣的組合。再加上其製作的乾隆二十五年農曆五月也與匣頂乾隆皇帝御製詩的時間「乾隆庚辰（1760）仲夏（農曆五月）」一致，因此，此記載中錢幣裝匣紀錄所指的應該就是冬宮所藏第一盒錢幣。如果此推論正確，在這些《活計檔》紀錄中所

---

4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匣裱作〉，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冊 25，頁 158-159。

指的錢譜應該就是盒中所附繪製有錢幣圖像與抄錄奏摺的冊頁。這一匣錢幣在十一月初一日裝匣完成，並依乾隆皇帝指示被放入紫光閣，[45]將此匣代表征戰西域成果的戰利品之一放到陳列清帝國戰功的紫光閣。[46]將來自新疆的古錢與普爾裝匣陳設後，乾隆皇帝顯然還戀戀不忘宮中仿鑄的普爾錢，造辦處「匣裱作」檔案中繼續記載：「於十一月初五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著將新鑄回子錢二個送進呈覽。欽此。隨將回子錢二個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留下一個，其餘一個收貯。欽此。」乾隆皇帝特意要求檢視前述新鑄但已經「持出」的那兩個普爾錢，最後決定留下一個，收貯一個。

總之，裁剪掉富德原奏中關於「唐朝、宋朝舊錢二三十枚」的記載，加入「唐宋時錢二十七品」於群臣記事文中，並於裝匣過程中，先是仿鑄，繼而補入兩枚舊普爾錢，都在以不露痕跡的方式將整匣錢幣的整體數量控制爲三十二個。究竟爲何要堅持此「三十二」的數字？除了三十二是滿清之本「八旗」之「八」的倍數外，另外讓我們想到乾隆十三年創制清篆三十二種的舉措，而事實上盒冊劉統勳的恭和詩也提到「何年昉製挑爲樣，歷代兼收篆峇同」，[47]把乾隆皇帝對普爾錢的改制與仿漢古篆創清篆三十二體一事相提並論，[48]究竟回疆的錢幣與清篆有何關係？在討論第二匣錢幣的裝匣時再進一步討論。

---

45 「於十一月初一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回子《錢譜》紫檀木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奉旨：著擺紫光閣。欽此。於本日將錢並匣子持赴紫光閣安訖。」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匣裱作〉，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冊 25，頁 159。

46 關於乾隆皇帝如何陳列帝國武功，見馬雅貞，《刻劃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47 見附錄一。

48 關於創造清篆三十二體部分及相關研究，感謝林士鉉的告知，見林士鉉，〈契約文書中的滿漢合璧印章：以《宜蘭古文書》爲例〉，《政大史粹》，期 4（2002 年 7 月），頁 1-20；林士鉉，〈皇矣陪都，實則帝鄉：乾隆皇帝與滿、漢文《御製盛京賦》〉，《故宮文物月刊》，期 367（2013 年 10 月），頁 52-67；林士鉉，〈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典藏滿漢文篆字《御製盛京賦》版本探究〉，收入白文煜主編，《清前歷史與盛京文化（清前史研究中心成立暨紀念盛京定名 380 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卷）》（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5），頁 373-388。

「古蚨遠至」錢幣匣與清帝國的「同文」論述

如果第一匣錢幣作爲戰爭的見證，由實際征戰的將軍上呈被征服人民繳交的物貢，則第二匣錢幣則是被征服的土地所「上呈」的土貢。因爲此匣所收的五十一枚錢幣爲侍衛德保在清廷平定回部後，帶領蒙古數學家與地圖測繪專家明安圖在回疆進行地圖測繪時，在于闐掘地出土的。木匣外盒尺寸長寬皆爲 17.5 公分，高爲 8.4 公分，稍大於第一盒「泉流歸極」，然差距不大。匣外部刻有與第一匣完全一樣的詩文，兩者在形制與包裝上完全一致。第二盒錢幣內部也有三屜錢幣，分別裝有錢幣 16 枚、16 枚與 18 枚，全部共收有錢幣 51 枚。除了唐宋錢幣外，還有漢與梁的錢幣及西域屈支國與迦畢試國的錢幣。同樣內附有木夾板爲封面的冊頁一冊，木板封面刻有金彩「古蚨遠至」四字，第一開與第二開爲乾隆皇帝於圓光內書寫「古蚨」與「遠至」御筆，第二開左頁左下有乾隆皇帝御印「幾暇怡情」與「得佳趣」二枚。

第三開爲德保隨錢幣上呈之滿漢兩體奏摺，右頁爲漢文，左頁爲滿文，漢文內文如下：

> 侍衛臣德保謹奏：臣奉命帶明安圖測量西域地形高下，仰見我皇上聖武遠揚，版圖式廓，亘古所未有。所過部落番民，咸嬉娛鼓舞，感戴大皇帝再造之恩，貿遷生聚，同遊化宇。臣於和闐經過，掘地得古錢五十一枚。竊以今方改鑄普爾錢，虔奉天朝正朔，以昭大一統之盛，而絕域古錢，應時並至，率土獻琛，效應如響。臣不勝欣忭，謹馳進以聞。謹奏。[49]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早在康熙時期就在傳教士的協助下，對全國進行測繪，歷經三十餘年，終於完成《皇輿全覽圖》，採用經緯度法，梯形投影，比例爲 1:1400000，爲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根據實地勘測所繪製的地圖，可說是當時全

---

[49] 第二匣內《古蚨遠至》冊頁，第三開右頁。

世界最先進而準確的地圖。[50]很可惜的是，這個地圖缺哈密以西的區域，因此當乾隆二十年準部初步底定，他馬上調遣人員進行新疆北部的測繪，而乾隆二十四年清軍終於平定回部，統一了天山南北，乾隆再次派出了地圖測繪團隊，此團隊即由明安圖率領西洋傳教士傅作霖、高愼思、鮑友管、劉松齡等所組成。[51]因此，德保所帶領的正是這個由明安圖所領團的地圖測繪團隊。[52]過去十年出版的滿文檔案，提供了許多之前研究沒有看到整個測繪計畫與團隊組成的細節。例如，早在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軍機處對於要不要派遣當時已經六十八歲、任職於欽天監的蒙古族數學與地圖測繪家明安圖前往主持測繪，還特別上奏詢問乾隆皇帝，[53]乾隆皇帝顯然對於曾經參加過乾隆二十一年（1756）所進行的新疆北疆準部測繪之明安圖相當倚重，因此堅持派遣其擔任新疆南疆回部測繪的領隊。也因此，檔案顯示軍機大臣傅恆於四月上奏報告選派侍衛隨明安圖前往葉爾羌等處測繪的情形。[54]五月，傅恆再次上奏賞賜明安圖前往回疆測繪銀兩一事。[55]由三等侍衛德保閏六月十七日的奏文，我們知道德保應該就是傅恆選定陪同明安圖前往回疆的侍衛。[56]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辟展辦事大臣定長等奏文顯示，德保一行人應該在此際經過辟展前往葉爾羌，並由定

---

50 關於清宮的輿圖繪製研究眾多，僅略舉以爲例，見秦國經、劉若芳，〈清朝輿圖的繪製與管理〉，《中國古代地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清代卷，頁 71-78；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卷 30 期 1（2012 年 9 月），頁 55-85。

51 關於乾隆朝的地圖測繪，見侯德仁，〈乾隆年間新疆地區的輿圖測繪〉，《文史知識》，2008 年第 8 期，頁 27-32；秦國經、劉若芳，〈清朝輿圖的繪製與管理〉，頁 73-74；孫喆，〈乾隆《內府輿圖》上疆域的變化〉，《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頁 140-164。

52 關於明安圖的研究，見史筠，〈明安圖在欽天監五十餘年工作記略〉，《內蒙古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63 年第 1 期，頁 89-101；方匀，〈明安圖研究〉，《內蒙古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1993 年第 3 期（科學史增刊），頁 44-47。

53 〈〔軍機處〕奏明安圖已年邁可否派其前往葉爾羌測繪輿圖請旨片〉（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37，頁 213。

54 〈軍機大臣傅恆奏選派侍衛隨明安圖前往葉爾羌等處測繪輿圖片〉（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38，頁 56。

55 〈軍機大臣傅恆奏賞前往葉爾羌等處測繪輿圖之明安圖等銀兩片〉（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38，頁 69。

56 〈三等侍衛德保等爲前往回疆校勘將軍兆惠等所繪輿圖事呈文〉（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十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39，頁 379。

長負擔其旅費。[57]德保一行人在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就抵達葉爾羌，[58]並在十一月十五日左右由此前往和闐，[59]十二月初九即已完成測繪打道回京。[60]此行人於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經過哈密，[61]最晚在四月前應該已經回到北京，因爲軍機處此時已經爲是否賞賜德保上奏乾隆皇帝裁示，[62]同時也將完成的伊犁回疆地圖上呈給乾隆皇帝御覽。[63]

這個團隊在測繪調查之時，於和闐考掘出土了 51 枚中外錢幣，我們雖然不知道德保確實上奏的時間，但是對比上述德保一行的行程，其得到這批錢幣的時間應該是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左右。德保認爲在改鑄普爾錢以奉天朝正朔之際，這些古錢「應時並至」，應該是這片土地所獻上的珍寶，以響應此錢幣改制以奉天朝正朔之舉。

與第一匣錢幣一樣，接續在此滿漢奏摺之後爲三開的錢幣圖繪，其後爲詞臣的言說。內文爲：

> 乾隆二十有四年，歲在己卯，大兵即〔既〕定西域，諸回部咸隸版圖，乃改鑄其普爾錢，虔奉天朝年號，用昭同文之治，而侍衛臣德保奉命率工繪圖於和闐，因以彼中所有唐宋及外國錢五十一品以進。臣等謹按：唐宋時花門于闐間有信使通中國，此或其市易所流布，至迦畢試

57 〈辟展辦事大臣定長等奏支前往葉爾羌測繪輿圖之侍衛德保等盤纏片〉（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0，頁 205。

58 〈駐烏魯木齊辦事三等侍衛德保爲抵達葉爾羌看過富德等所繪地圖後即赴和田事咨呈〉（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2，頁 193。

59 〈三等侍衛德保爲報自葉爾羌啓程至和田繪製地圖呈文〉（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2，頁 411。

60 〈三等侍衛德保奏回疆地圖繪製完畢啓程回京摺〉（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3，頁 189。

61 〈哈密幫辦大臣永寧等奏赴葉爾羌繪圖之乾清門侍衛德保等路經哈密回京片〉（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4，頁 43。

62 〈軍機處奏應否賞賜繪製回疆地圖之乾清門侍衛德保等片（附上諭 1 件）〉（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5，頁 232。

63 〈軍機處奏將所繪伊犁回疆地圖呈覽片〉（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5，頁 440。

諸國，其去中土遠絕，絕無可考。我皇上德威所被，無遠不〔弗〕屆，遂使絕域異品，同為貢琛，覈之洪遵《泉志》，無不脗合。仰見聖漠廣運，超越隆古。臣等排次之下，不勝欣幸，請匣藏之，與盖地之圖，同垂萬禩云。臣蔣溥。臣劉統勳。臣梁詩正。臣劉綸。臣董邦達。臣裘曰修。臣于敏中。臣觀保。臣王際華。臣錢汝誠。臣錢維城。臣蔣檙。跋。[64]

此次詞臣的組合略有不同，沒有介福與金德瑛，增加了蔣檙，有別於第一盒是群臣捧觀回疆錢幣，第二盒錢幣所記載乾隆皇帝請群臣「排次」錢幣一事應是另一個場合，此次聚會應該在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德保於和闐得到錢幣以後。在第二次聚會，群臣對於西域出現中國錢幣一事的解釋並不出第一次的論述，基本上都認爲這是唐宋時與回紇外交與市易流布的結果。另外，此次還出土阿富汗境內古國迦畢試（Kapisaya）等國罕見的錢幣，群臣則以祥瑞政治的修辭表示此乃「皇上德威所被，無遠不屆」所致，甚至此「絕域異品」也前來朝貢。群臣並查閱了宋代洪遵的《泉志》，發現這些罕見的外國錢幣與其記載「無不脗合」，更加證明了「聖漠廣運，超越隆古」，因此建議裝匣收藏之，並與此次測繪製作的地圖，一起「同垂萬禩」。

值得注意的是，兩匣所收的錢幣雖然是來自兩次不同的上呈，而群臣檢視錢幣的時間與人員也不同，然而兩者在宮中裝匣的時間卻極爲接近，再加上兩者包裝與呈現形式的統一，應該被視爲同一組的呈現。這可以在宮中《活計檔》的記載中得到輔證。第一匣錢幣於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進行配匣盛裝的工作，並於同年十一月完成裝匣並放置到紫光閣。第二匣錢幣則稍晚於七月交付宮中作坊進行裝匣的工作，並於十二月完成。主要根據下面三條《活計檔》之「匣裱作」的記載：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內的記載：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古錢五十一個、隨《錢譜》冊頁樣一件，傳旨：著照先

64 《古蚨遠至》冊頁，第七開。

做過裝古錢匣一樣，配匣盛裝，得時交如意館畫《錢譜》，先呈樣。欽此。

於八月初三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古錢五十一個配得罩蓋匣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欽此。

於十二月二十七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古錢五十一個配得匣交如意館訖。[65]

此「古錢五十一個」正是第二匣由新疆掘地而來古錢的數目，乾隆皇帝命以之前古錢匣的方式配匣盛裝，交由如意館畫《錢譜》，並要求先呈樣。八月初三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帶來宮中工坊配好的「罩蓋匣樣」交給太監胡世傑送呈預覽，而「罩蓋匣」爲上層盒蓋罩蓋下面底盒的形式，正是這兩匣錢幣匣的現狀。考慮與前一匣裝匣時間的接近、內容數量的一致，且匣盒種類也相符，因此所指的應該即是冬宮第二匣錢幣的裝匣工作。此配匣工作到同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才完成，依乾隆皇帝指示將此古錢 51 個裝好匣送交如意館，可能是爲了將其送去如意館配上之前所命繪製放在匣內的《錢譜》冊頁之故。

這些新疆上呈的錢幣，皆先繪《錢譜》冊頁樣，然後與錢幣一起上呈御覽。在乾隆皇帝的指示下，根據上呈的《錢譜》冊頁樣配匣，然後再由聚集宮中最高級工匠的如意館重新繪製《錢譜》冊頁圖錄，並與錢幣一起以罩蓋匣裝盛陳設。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是回人處所得到的中國古錢與還在使用的舊普爾錢，爲受統治的臣民所進貢的物品；而後者則是在測繪回疆地圖時掘地而來，爲受統治的土地所進獻的物品。因此群臣特別建議，應該與根據土地實際測量繪製而成的地圖一起收藏。

將新疆納入清朝版圖，無疑是乾隆朝最重要的武功之一，也是中國史上版圖最大規模的擴張。[66]乾隆皇帝對於這個區域的帝國化進行了非常多層次的細

---

6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匣裱作〉，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冊 25，頁 191。

66 關於乾隆皇帝的武功與其西征，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緻管理，從勒石戰地豎立記功碑，[67]到改制貨幣，並積極地對此區域進行實際地圖測繪與記錄節氣時刻，將其納入帝國的版圖與時間。例如乾隆二十年準部甫定，乾隆皇帝即著手進行該區域的地圖測繪，即言：「西師報捷⋯⋯西陲諸部，相率來歸，願入版圖。其日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以昭遠裔向化之盛。侍郎何國宗，素諳測量，著加尚書銜，帶同五官正明安圖，司務那海，前往各該處，測其北極高度，東西偏度，繪圖呈覽。」[68]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疆後，乾隆二十五年四月欽天監也奉奏「回部盡入版圖共四十三部，謹按：測量輿圖經緯度，擬選二十五部增入《時憲書》，並奉硃筆添改『依里齊』為『和闐』」，[69]乾隆皇帝不僅指示將回部納入《時憲書》，且還將音譯的名字「依里齊」改為具有平定吉祥意涵的地名「和闐」。

值得注意的是，統一貨幣、地圖與時間，除了與帝國實務的管理有關外，和立碑與更改地名一樣，都是很重要的政治塑造。由於天子之道乃是順天之道，因此如何以天道塑造其統治的正當性，絕非只是無關重要的錦上添花。甚至可以說，政治的象徵性論述是中國政治的重要實體。這兩匣錢幣分別命名為「泉流歸極」與「古蚨遠至」。前者「歸極」一詞出於《尚書》〈洪範〉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70]意指帝王以順應天意的最高法則來匯聚臣民，而臣民也會歸附此最高法則。因此，「泉流歸極」不僅是錢幣的回歸，更是在實踐「皇極」之道後，西域臣民的歸附。而「古蚨遠至」的「蚨」雖然是錢幣的通稱，而「蚨」原指古書中提到的一種蟲。傳說青蚨生子，母與子分離後，必定會回

[67] 豎立西域相關征戰的記功碑的地點並不限於新征服的新疆地區，而是透過太學與孔廟的系統，從中央到地方遍及全國，通常一個孔廟會有紀念雍正三年（1725）發生的平定和碩特蒙古叛亂《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乾隆十四年（1749）的《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然後為《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與《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此即「四大平定碑」。即使在與新疆無關的江南地區也會有上述四大平定碑。這些記功碑的拓片同時進入乾隆皇帝賞賜臣下的禮物系統，因此，清帝國的戰功透過看似與軍隊沒有關係的教育體制與賞賜系統不斷地被複述。關於清帝國的造碑運動見 Yun-chiu Mei,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68]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85，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癸卯，頁 79。

[6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冊 19，頁 181。

[70] 〔漢〕孔氏撰、〔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 1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4，頁 246。

聚在一起，因此民間方術有言，如果把母蟲與子蟲的血各塗在八十一文銅錢上，有時先用母錢，有時用子錢，用掉的錢都會再飛回來，如此循環反覆，就有用不完的錢。[71]換言之，「古蚨遠至」也不僅是指遠方古錢的到來，更是母子不可阻擋的重聚，在此當然是意指西域對清廷的回歸。總之，新疆這片區域，即使原非中國的領土，如群臣們所言「初非列版圖而通泉貨」，[72]而今皇上「德威遐暨」，「纏頭冒耏之輩」紛紛來歸。[73]透過改制普爾錢，「圜法仍較子母同」，[74]新疆與清廷有了相同的貨幣系統，兩者就如青蚨子母般，必定相聚回歸。

饒有趣味的是，這兩盒錢幣的內容雖然是回疆的舊普爾錢、流通當地的中國古錢與和闐出土的各種古錢幣，並沒有改制後的新普爾錢，且事實上，乾隆皇帝寫作御製詩的乾隆二十五年五月，政策雖已發布，然新的普爾錢因爲工匠耽擱在路途上，也還沒開鑄，但是群臣的和詩與記文中卻仍不斷出現上述「圜法仍較子母同」，[75]或「煥我同文」、[76]「皇朝正朔表文同」、[77]「普爾從茲奉大同」、[78]「鑄文要識紀元同」、[79]「圜法全歸九府同」、[80]「圜法欣隨職貢通」[81]等讚頌錢法「同文」的詩文。如果考慮兆惠向乾隆皇帝所提的二個方案內容，對

---

71 《淮南萬畢術》中〈青蚨還錢〉注：「以其子母各等，置甕中，埋東行陰垣下，三日後開之，即相從，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亦以子血塗八十一錢，以其錢更互市，置子用母，置母用子，錢皆自還也。」〔宋〕劉安著，〔清〕茆泮林輯，《淮南萬畢術》，收入《淮南萬畢術外四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頁 12-13。

72 《泉極歸流》冊頁，第七開右頁。

73 《泉極歸流》冊頁，第七開右頁。

74 出自蔣溥刻於第一匣錢幣外側唱和詩，見附錄一。

75 出自蔣溥刻於第一匣錢幣外側唱和詩，見附錄一。

76 《泉極歸流》冊頁，群臣記文，第七開右頁。

77 出自盒冊錢汝誠恭和詩，或錢維城文集中，見〔清〕錢維城，《鳴春小草》，卷五，頁 10 上-下，出自《錢文敏公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46，頁 416。

78 出自盒冊錢維城恭和詩，見附錄一。

79 出自盒冊梁詩正恭和詩，見附錄一。

80 出自于敏中恭和詩。值得注意的是，于敏中個人詩文集中載的是另一首詩〈駐札葉爾奇木大臣呈覽所鑄乾隆通寶至因用排次回部錢文詩韻紀事〉:「洗兵蒲海輯豐功，泉布兼隨月軌通。入范良金成賦遠，當陽寶紀考文同。圜函定制堪垂久，銖兩從宜與折中。篋衍拜觀知利用，纏頭腰貫得纏躬」，見〔清〕于敏中，《素餘堂集・經進詩》，卷 14，頁 6 下-7 上，出自《素餘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34，頁 330-331。

81 出自盒冊王際華恭和詩，見附錄一。

乾隆皇帝與群臣來說，改制的普爾錢（即使加鑄清文與年號）事實上仍與內地制錢有別，因此「圜法全歸九府同」的「同」究竟是哪一個意義上的「同」？最表面的答案當然是如錢維城對「皇朝正朔表文同」的註解，指「上命仍其舊製，惟于陽面加鑄乾隆通寶四字」的「表文同」的層次。然正如上述，劉統勳的恭和詩將回疆的「圜法同文」與被視為「書同文」的清篆創製相提並論。[82] 他更認為回疆錢幣的同文回歸不僅是「青蚨去復返」，實際上更超越青蚨子母往復的層次。因此，回疆的「圜法同文」究竟是何意？

學者們早已經注意到「同文」事實上是清代各類文獻常常出現的詞彙，官方典籍更常常強調以「同文之盛」作為施政目標。然不同於傳統中原王朝的「書同文」所指稱的具體上文字相同，清廷則是強調不同文字都有「載道」的功能，只要透過翻譯與對比，任何文字都可以達到對「道」的追求。因此「同文」與「大同」在清廷的語境中常被並置，因而有種幽微的對等關係。[83]最值得注意的例子之一是，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要求大臣將「國書仿各體篆法繙寫成字」，[84] 最後「援據古法，成三十二類，且請以朕製《御製盛京賦》繕成清漢篆文，既廣國書，併傳古篆」，[85]也就是最後作成滿文篆書體共三十二種，並以《御製盛京賦》為範例書寫頒布。林士鉉認為乾隆皇帝的用意「乃是欲規範滿文篆體，使得『清篆』可與『漢篆』相配」。更指出在確定清篆後，清廷以其中九種作為官方璽印之用，並對宮廷用璽印進行重刻，讓清篆正式進入帝國禮制與代表

---

82 劉統勳盒側恭和詩全文為：「底績西戎敘九功，�沖泉貨漸開通。何年昉製挑為樣，歷代兼收篆沓同。豈是青蚨去復返，也隨白帽外歸中。利民鑑古天王意，都護平均勵匪躬。臣劉統勳恭和。一印『臣勳』。」見附錄一。關於清篆如何被視為「書同文」，林士鉉舉晚清旗人文孌《清篆舉隅》的〈序〉中所言，見林士鉉，〈皇矣陪都，實則帝鄉：乾隆皇帝與滿、漢文《御製盛京賦》〉，《故宮文物月刊》，期 367，頁 62-63。

83 關於清代的同文論述，見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2），頁 93-99；林士鉉，〈同文之盛：以滿州文字寫蒙古語文〉，《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第七章，頁 279-368；馬子木、烏雲畢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語文政治文化的構擬與實踐〉，《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頁 82-94。

84 見〔清〕傅恆，〈御製盛京賦奏（乾隆戊辰）〉，《欽定盛京通志》，卷 130，國朝藝文 16，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03，頁 628。

85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24，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癸亥，頁 355。

王權的印記典範中。[86]清篆三十二種中的數量「三十二」，正是第一匣錢幣由原來上繳錢幣加上宮中加鑄兩枚普爾錢而湊成的數字。我們不確定「三十二」，或第二匣的數字「五十一」各有何象徵意義？然可以確定的是，對乾隆皇帝來說，對回疆錢幣的改制與清篆的創制都是帝國「同文」的舉措。

有趣的是，清篆雖然是仿漢篆而來，還是滿文，就漢文來說，還是另外一種必須要學習的文字。為何對於乾隆皇帝，或甚至帝國下的旗人而言，清篆的創發卻被認為是一種「書同文」的舉措？[87]除了學者從文字翻譯的角度來解釋「同文」外，在清帝國的語境中，「圜法同」與「書同文」等所代表帝國層次的一統，並不一定是現代國家意義下標準化的劃一，亦即其並非指實質內容完全的等同，而是以某種相同框架連接且結構整個帝國，但卻容許或甚至要求在這個結構性的框架下，各個內部的內容有所區別。在錢法的例子中，這個框架是外圓內有方形穿孔的錢幣形式，配合正面書寫漢文乾隆通寶及背面以滿文與地方文字書寫鑄造局的格式；在清篆的例子中，則是漢篆與清篆個別與古代篆書的形式連結。這就像我對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所啓動的《職貢圖》大型圖像編纂計畫的觀察一樣，[88]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圖像如何從原來地方上繳強調各帝國各民族生理外貌特徵的原始材料，經過不同版本層層抄錄、模寫與整理，外貌被逐漸「統一化」，回人、西洋人、東南亞各國人民在去掉髮飾等外在裝飾後，外貌與膚色等並沒有太大的區別（附圖 5）。換句話說，在統一的形體外貌下，「服飾」在此就像普爾錢與制錢不同的材料（紅銅）與文字（回文），或是清篆與漢篆在看似同樣的古篆字形貌下不同的文字傳統，變成定義

86 林士鉉，〈皇矣陪都，實則帝鄉：乾隆皇帝與滿、漢文《御製盛京賦》〉，《故宮文物月刊》，期 367，頁 61-62。

87 林士鉉舉晚清旗人文燮《清篆舉隅》的〈序〉中所言，見林士鉉，〈皇矣陪都，實則帝鄉：乾隆皇帝與滿、漢文《御製盛京賦》〉，《故宮文物月刊》，期 367，頁 62-63。

88 Yu-chih Lai, "Costuming the Empire: A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of Tributary Paintings at the Qianlong Court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Lynda Klich and Tara Zanardi, eds., *Visual Typologies from the Early Modern to the Contemporary: Local Contexts and Global Practi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90-103;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2012 年 3 月），頁 1-76。

與區別，同時也是成就，帝國下多元子民的主要工具。而此爲乾隆皇帝認爲中國歷代帝王所未曾達到的眞正「大同之治」。

此點可以在《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所刊載與前述「泉流歸極」錢匣頂刻寫的御製詩並置的另外一首御製詩中得到證實。此首御制詩同樣有「庚辰」（1760）紀年，標題爲〈御制駐紮葉爾羌大臣呈覽所鑄乾隆通寶至，因用排次回部錢文詩韻紀事〉。此詩應該是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葉爾羌鑄錢局在寶陝局支援下開鑄後，葉爾羌大臣回京回報成果，乾隆皇帝爲此而寫的。詩文如下：

> 作歲元戎奏定功，早籌鼓鑄市鄽通。
>
> 即看大冶範熔就，仍屬司農職掌同（將軍兆惠歸為戶部尚書）。
>
> 寶是乾隆來自外，錢殊景德去由中（排次回部古錢時，有景德開元諸錢，彼時未能臣服其地，自屬中國攜往者）。
>
> 用權子母底其貢，載戢干戈省厥躬。[89]

由詩中括號的小字註解，可以發現兩個重點，首先，此新鑄普爾錢事務在兆惠建議下歸屬戶部所掌，換句話說，在行政意義上，新疆事務已是內政的一部分。另外一個則是，再次強調之前排列的回部古錢中「有景德開元諸錢」，唐宋時「未能臣服其地，自屬中國攜往者」。在此詩文下更有臣工案語提到：「開元景德古錢流傳，當唐元（玄）宗宋眞宗時，以和親互市，羈縻異域，偶自中土攜往，留貽至今，實無當於大同之治也」，[90]案語再次說明當地有中原古錢，只是從中國攜往，即《泉極歸流》冊頁所言「初非列版圖而通泉貨」，並強調唐宋「實無當於大同之治也」，言下之意，乾隆皇帝此際的收征新疆，改鑄普爾錢，正如其臣工所言，「仿鎔範於中朝，既發新型，兼排古制」，[91]才是眞正的「大同之治」。

歸結這兩盒錢幣在清宮的成立，乾隆二十四年清廷平定回疆，兆惠提議改鑄回部錢文，富德應該在此年的五月左右上呈其於和闐回人處得到的唐宋古錢

89　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卷 35，頁 480。
90　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卷 35，頁 480。
91　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卷 35，頁 480。

與回疆使用的普爾錢，乾隆皇帝因此命蔣溥、劉統勳、梁詩正、劉綸、董邦達、裘曰修、于敏中、介福、金德瑛、觀保、錢汝誠、王際華、錢維城等十三位大臣同觀排次。同年七月時，乾隆皇帝已經指示改制普爾錢，雖然沿用原來普爾錢的材質（紅銅）與重量（二錢重），但將原來打壓法製造如核桃狀的舊普爾錢改爲以澆鑄法鑄造外圓方孔的造型，並且採取內地制錢的形式於正面鑄乾隆通寶漢字，背面鑄鑄造局的清文與回文。約略在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左右，侍衛德保被派遣隨任職於欽天監的明安圖前往回疆測繪，一行人於十一月左右於和闐掘地發現 51 枚古錢並上呈，乾隆皇帝又命大臣蔣溥、劉統勳、梁詩正、劉綸、董邦達、裘曰修、于敏中、觀保、王際華、錢汝誠、錢維城、蔣檙等十二人捧觀。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乾隆皇帝最晚在二十四年七月就已經指示要改制普爾錢，並指示宮中送出樣品，然新疆最早的葉爾羌鑄錢局一直要到乾隆二十五年才設立，且由於地方工匠無法勝任內地的鑄造技術，必須由陝西寶陝局支援工匠與器具，而這批工匠與器具三月初由西安出發，一直到八月才到達，九月才開始鑄造。在此期間，乾隆皇帝可能爲了這兩批錢幣的裝匣於二十五年五月著手寫作了御製詩，並有八位前面觀看過錢幣的詞臣恭和。而五月也是第一匣開始裝匣的時間，一直到十一月才結束，清宮工坊還仿製了二枚普爾錢混雜其中，完成後陳設於紫光閣。第二匣「古昳遠至」的成立約略同時，開始於七月，結束於十二月，應該也是陳設在紫光閣。

檢視同治元年（1862）的《紫光閣武成殿大檔》所載的「武成殿陳設」，發現「古錢三十二枚泉流歸極錢譜一冊」與「古錢五十一枚古昳遠至回子錢譜一冊」（附圖 6）兩匣錢幣與「御製西師詩開惑詩冊頁二冊」、「御製回部告成太學碑文四十冊」、「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等平定新疆相關文物並置，[92]顯然至少到同治年間，兩匣錢幣一直都存放在紫光閣中，爲乾隆皇帝對於新疆納入清廷版圖之正當性的政治論述的一部分。如果兩者一直到晚清前都陳設在紫光閣，如何可能做爲乾隆皇帝贈送給凱薩琳女王的禮物？兩者作爲

92 〈武成殿陳設〉（同治元年[1862]），《紫光閣武成殿大檔一部》，卷 1，收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南海檔案》（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冊 23，頁 9。

八國聯軍後的散逸文物而爲冬宮收藏的可能性是否較高？由於冬宮相關研究館員堅持其爲外交禮物，如其確有可能，考慮錢匣內錢幣不無仿鑄，清宮是否也有可能複製紫光閣內的陳設錢匣作爲禮物？如果眞的作爲外交禮物，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禮物？要回答上述問題，我們需要對於清宮錢幣的收藏與使用脈絡作一了解。

乾隆朝宮中舊藏錢幣的整理與再製：仿鑄古錢與擬真圖譜

收藏錢幣與爲其編纂圖譜在中國有非常長的歷史，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出現錢幣的專門著作，例如，劉氏《錢譜》與顧烜《錢譜》等，之後錢譜的編纂與寫作絡繹不絕，[93]例如，唐代有封演的《續錢譜》，兩宋時代更因金石學的盛行，出現了許多錢譜相關著作，包括李孝美的《歷代錢譜》、董逌《錢譜》、金光襲《錢寶譜》、姚元澤《錢譜》、陶岳《貨泉錄》、洪遵的《泉志》等，元明雖然盛況不再，也有元費著《楮幣譜》與明陸深《寶貨志》等。到了乾隆十五年宮廷編纂《欽定錢錄》之際，正如其〈序〉所言：「歷代錢文，前世纂述，如顧烜、封演、姚元澤、張台、陶岳、金光襲、李孝美諸人所著，第散見於載籍，久無專書。董逌譜則缺而弗全，或疑其贋作，今單行於世，號爲完書者，惟南宋洪遵《泉志》一編」，[94]前代專著多已散逸，僅留有南宋洪遵的《泉志》，與乾隆朝所編的《欽定錢錄》一起收入《四庫全書》中。清代由於金石學的復興，錢幣的收藏、研究與著述到達另一個歷史的高點，尤其乾隆十五年開始編纂的《欽定錢錄》，爲史上第一本官修的錢譜相關著作。即使民

93 關於中國錢幣著錄的發展，見潘勝強，〈清代古錢幣收藏與研究述略〉，《碑林集刊》，期 18（2012 年），頁 232-240；同作者，〈清以前的錢幣學研究及其撰述簡論〉，《中國錢幣》，2013 年第 6 期，頁 16-23；同作者，〈清代泉學典籍的繁興及其主要類型〉，《歷史文獻研究》，總期 32（2013 年），頁 284-293。

94 〔清〕梁詩正、蔣溥等謹序，〈序〉，《欽定錢錄》（175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4，頁 2。

國錢幣權威丁福保認爲其中內容「沿誤踵謬，附會失實」，[95]但是正如光緒年間錢幣專家饒登秩所言：「風尚既開，纂述蠭起」，[96]《欽定錢錄》的編纂可說是以皇帝之尊引領開創了有清一代錢幣學研究的復興風尚。《欽定錢錄》編纂幾乎成爲有清一代類錢譜編纂的典範格式，[97]例如，除了將「外域」、「撒帳」、「異錢」、「厭勝」等分類著錄，使其「各成一門」外，其他錢幣「則一以編年之法行之……固不必多分品類」，此體例爲之後許多清代錢譜編纂所遵循。

將冬宮的這兩盒錢幣的組合放在中國錢幣史的脈絡來看，最大的差別之一在於隨附譜錄對於盒內錢幣的紀錄方式。不同於前代的錢幣圖錄多以線描圖或拓本的模式來描繪錢幣（附圖 7），這兩盒錢幣內所附的圖譜不但是彩色圖繪，且是以宮廷受到西洋影響所發展出來的西洋折衷風格呈現（附圖 8）。畫家以幾乎看不到筆觸痕跡的手法描繪每一枚錢幣的形狀、光影、錢文、甚至鏽蝕的色澤與質感等綿密的細節。根據我之前對於宮中此際所同時進行的《鳥譜》、《獸譜》、與《職貢圖》等製作的研究，[98]這種特別的風格在宮中常常是用來指涉與現實有關的存在，藉由此種西洋折衷法對質感與體積感的精密描繪，畫家泯滅了觀者欲藉視覺經驗來區別虛構的與現實眞實存在的可能。例如，在《獸譜》中的例子，當畫家以同樣風格並置《山海經》中的「開明獸」與馬或牛等日常生活中的動物（附圖 9），脫離了現實經驗，觀者並無法判斷「開明獸」是否比牛馬不眞實或甚至是虛構的，整體風格的運用意欲使觀者認爲「開明獸」與牛馬一樣爲現實中的存在。[99]換句話說，至少在乾隆朝宮廷的脈絡中，這種

---

95 丁福保，〈欽定錢錄跋〉，《古錢大辭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2），頁 310。

96 饒登秩，〈古歡齋泉說〉，引自丁福保，《古錢大辭典》，頁 304。

97 潘勝強，〈清代泉學典籍的繁興及其主要類型〉，《歷史文獻研究》，總 32，頁 284-293。

98 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1-76；同作者，〈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卷 29 期 2（2011 年冬季），頁 1-75；同作者，〈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爲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0（2013 年 6 月），頁 1-75。

99 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爲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0，頁 1-75。

風格的使用與現實的存在指涉密切相關。有趣的是，爲何這兩盒錢幣的圖譜放棄了中國傳統線描圖或拓本的方式而改以西方折衷畫法繪之？考慮盒中已經有實體的錢幣存在，這些錢幣的現實存在應該已經不需要透過圖像得到確認，因此讓我們更加好奇爲何此兩冊乾隆宮廷製作的錢幣圖譜決定採用新的擬眞圖繪風格？只是爲了創造新的視覺效果嗎？

翻閱《活計檔》，可以發現這兩盒錢幣的製作應該是乾隆三年就開始的一連串對宮中歷代錢幣整理的延續。此一系列工作成果之一就是學界較爲熟悉完成於乾隆十六年的《欽定錢譜》之編纂與出版，而這也是兩錢匣外罩盒冊錢汝誠的恭和詩中提到「再譜西清《錢錄》後」之故。最早我們可以看到《活計檔》乾隆三年八月「匣作」記載：

> 十一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古錢大小二匣，共五百十五個，《錢譜》冊頁二冊，內盛歷代古錢共五百九十七個。傳旨：《錢譜》冊頁二冊著人認看，挑選好的一冊，將古錢按《錢譜》次序攢湊一匣盛裝。若《錢譜》上有樣，現交之古錢內若無，可令尋找添補。其匣長寬照《錢譜》冊頁尺寸、高矮照錢匣尺寸書套款式做。欽此。[100]

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太監胡世傑上交一大一小匣的古錢二匣，內含 515 個古錢。同時上繳的還有兩冊《錢譜》，兩冊「內盛」古錢 597 個。我們不確定此「內盛」何意？然就前述《活計檔》內《錢譜》通常指的是錢幣圖像的圖錄，則此「內盛」應該指圖錄中所涵蓋的圖像。兩冊內繪製的 597 個錢幣顯然要比大小兩匣錢幣共 515 個還要多，乾隆皇帝因此指示先就品質比較好的冊頁，照其繪製的次序，將實體古錢「攢湊一匣」；如果有圖像，但沒有實物，則尋找添補。最後還仔細指示如何將實物古錢與圖錄一起以「書套款式」配匣。[101]令

[10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匣作〉，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冊 8，頁 331-332。

[101] 此「書套款式」應該是類似《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及《西清續鑑．乙編等「西清四鑑」的書冊匣貯方式，見侯怡利，〈洞天日月多佳景——乾隆時期鏡匣的製作〉，

人玩味的是，有譜沒有實物者，乾隆皇帝指示要「尋找添補」，究竟如何添補呢？我們看到三個月後，同樣「匣作」即記載：

> 於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毛團、胡世傑傳旨：新擺古錢譜內古錢樣少，照畫樣上古錢樣著佛保鑄造。欽此。
>
> 於乾隆四年（1739）二月十八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毛團、胡世傑傳旨：將錢譜並古錢伺候呈覽。欽此。
>
> 於本日，即將古錢大小二匣共五百十五個、《錢譜》二冊內盛歷代古錢共五百九十七個。七品首領薩木哈交太監毛團、胡世傑呈覽。奉旨：將蔣廷錫畫的《錢譜》冊頁一冊留下，再《萬年國寶》另換書頭籤子送進，其古《錢譜》內錢並匣內古錢，照《錢譜》冊頁上錢樣擺做一書套匣盛裝。照《錢譜》上古錢樣，無有之錢照樣鑄造。其錢樣兩面有字樣者，鑄兩面字樣；一面有字鑄一面字，其一面做淨面。欽此。[102]

乾隆皇帝清楚地要佛保根據蔣廷錫《錢譜》圖譜上古錢的樣子照樣鑄造。乾隆皇帝不僅僅以仿鑄的方式補充缺失的古錢，且如上述強調「務與《錢譜》一樣」。此《萬年國寶》很可能是宮中收藏歷代古錢《錢譜》的總稱，因為在《乾隆上諭檔》五十一年（1787）曾記載：

> 遵旨查伊犁、烏什、阿克蘇、葉爾羌四處所鑄錢文，乾清宮藏貯《萬年國寶》錢譜內業經排入。茲向照看年班回部來京之侍衛等內有帶來烏什、阿克蘇、葉爾羌三處普爾錢各一枚，臣等查對與錢譜內所貯相符。謹將各錢拴簽進呈，似可無庸再向烏什等處行取。謹奏。十二月二十九日。[103]

收入吳曉筠主編，《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306-319。

10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匣作〉，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冊 8，頁 332。

10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冊 13，頁 668。

《萬年國寶》錢譜除了各朝古錢外，也包含當朝錢幣，宮中非常在意地方所鑄與宮中所藏是否一致，因此特別要以回部來京的侍衛所帶來的回部各鑄造局所鑄錢幣比對《萬年國寶》錢譜內收藏。此《萬年國寶》換過書頭籤子後，於乾隆四年三月初三日「隨錢四百六十五個，交太監毛團呈進訖」。[104]這個如火如荼進行的宮中錢幣整理，整體數量到底爲何？到底有幾套或幾組？沒有實物比對，很難確認《活計檔》中所提及細節具體爲何。除了一開始繳交的二冊《錢譜》與古錢 515 個外，《萬年國寶》錢譜是否爲另外一件？還是彙整二冊爲《萬年國寶》？不管如何，一年後，乾隆皇帝又要求將「《錢譜》送進呈覽」。《活計檔》因此記載：

> 於乾隆五年（1740）四月二十六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錢譜三十八板，內撥得古錢蠟樣一板，挑選得古錢並撥得蠟樣錢一板、原交出挑用有屜古錢並現有古錢共六百四十七個持進，交八品官高玉、太監毛團呈覽。奉旨：將現有古錢合譜的挑選應用；如古錢內不能敷譜者，著佛保照所少樣式鑄造，務與錢譜一樣。此錢譜三十八板分做二套，其套尺寸照錢譜大小一樣。擺錢的屜子糊月白綾裏、古色紙邊。殼面糊文錦。外套另行請旨。再現造古錢二套，俟造完之時，將三套合在一處，其錢譜擱在上層。欽此。
>
> 於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員外郎佛保、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按錢譜上燒造得古錢五十一件持進，交太監高玉等呈覽。奉旨：照樣准燒造。欽此。
>
> 於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等交錢譜一部、各樣古錢十九包，傳旨：著照錢譜款式、字樣，每板用楠木挖嵌做板，外配做一總套。先做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105]

10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匣作〉，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冊 8，頁 332。

10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匣作〉，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冊 8，頁 332-333。

乾隆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太監高玉等交出「《錢譜》三十八板，內撥得古錢蠟樣一板，挑選得古錢並撥得蠟樣錢一板，原交出挑用有屜古錢並現有古錢共六百四十七個」，此蠟板所指應該是用澆鑄法加鑄古錢所需的蠟模，但「現有古錢共六百四十七個」，究竟是前面古錢 515 個再加上新鑄古錢，還是另外一批？不管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乾隆皇帝再次指示「將現有古錢合譜的挑選應用；如古錢內不能敷譜者，著佛保照所少樣式鑄造，務與錢譜一樣」，並要求「《錢譜》三十八板，分做兩套，其套尺寸照《錢譜》大小一樣擺，擺錢的屜子糊月白綾裏、古色紙邊。殼面糊文錦」。前者《錢譜》指的應該是一板一板的糊月白綾裏擺錢屜子，後者則是指《錢譜》圖譜。爲了實物可以「合譜」，八個月後的年底，負責燒製的佛保等人「按錢譜上燒造得古錢五十一件持進」。乾隆皇帝雖然指示要將上述《錢譜》三十八板分做兩套，亦即一套十九板，此差事似乎到二年後才有進一步的進展。

乾隆七年（1742）八月二十四日交上了古銅錢十九包與錢譜一部，乾隆皇帝並下旨要「著照錢譜款式、字樣，以楠木挖嵌做板」，由於此楠木板要根據《錢譜》的樣式與銘文來挖嵌，所以可能不是爲了製作放置錢幣的槽，而很可能是作蠟樣的木模。其後並仔細地列上了每一開的內容，[106]前二開爲清代開國以來至乾隆時期的當朝錢幣，其後則爲新舊混置的「古錢」組合，例如第五

106 「計開：第一開：天命錢二個、天聰錢一個、順治錢十七個、康熙錢二十五個，共四十五個。第二開：雍正錢十五個、乾隆錢十四個，共二十九個。第三開：舊有古錢三個、新造金錢一個、新造銅錢三十七個，共四十一個。第四開：舊有古錢六個、新造銀錢一個、新造銅錢十七個，共二十四個。第五開：舊有古錢十一個、新造銅錢四十個、新造金錢一個，共五十二個。第六開：舊有古錢四個、新造鐵錢一個、新造銅錢五十二個，共五十七個。第七開：舊有古錢三個、新造鐵錢八個、新造銅錢四十三個，共五十四個。第八開：舊有古錢三個、新造銅錢五十個，共五十三個。第九開：舊有古錢一個、新造銅錢五十一個，共五十二個。第十開：新造銅錢四十三個、新造鐵錢七個，共五十個。第十一開：舊有古錢三十三個、新造銅錢二十二個，共五十五個。第十二開：舊有古錢四十八個、新造銅錢十四個，共六十二個。第十三開：舊有古錢五個、新造銅錢五十個，共五十五個。第十四開：舊有古錢七個、新造錢五十八個，共六十五個。第十五開：新造金錢二十三個、新造銀錢二十七個、銀銅合做錢一個、銅錢二十一個、鐵錢一個，共七十三個。第十六開：新造銅錢三十三個。第十七開：新造銅錢二十三個。第十八開：新造銅錢三十七個。第十九開：新造銅錢二十九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匣作〉，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冊 8，頁 333-335。

開的內容爲「舊有古錢十一個、新造銅錢四十個、新造金錢一個，共五十二個」等。

一個月後木模完成，「副催總達子做得木板錢譜樣二件、併原交出錢譜冊頁一部持進」，乾隆皇帝進一步指示「天聰、天命、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照木板樣式准做前二板。再將錢譜冊頁前四頁去了，另改畫，照木板上錢的款式一樣畫。其畫錢著盧鑒畫。其餘十七板，按原交出錢譜冊頁的款式一樣成做」。[107]顯然上繳的「木板錢譜樣二件」就是第一開與第二開當朝錢幣的部分，乾隆皇帝仔細指示前兩開要照交出的木板樣改畫原來《錢譜》冊頁圖譜部分，而後十七開要木板樣照《錢譜》冊頁來製作。

總之，最後於乾隆八年（1743）四月初十日，「司庫白世秀將做得錢譜二套持進，交太監高玉等呈進訖」。這兩套是否就是上面乾隆皇帝仔細指示所作木樣澆鑄而成？與作爲底本的一套，是否就是乾隆皇帝開始的指示「再現造古錢二套，俟造完之時，將三套合在一處，其錢譜擱在上層」的成果？雖然上述的推論，在沒有實物的輔證下，還有太多無法解釋的細節，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乾隆朝宮中所整理的錢幣內容爲眞的古錢與新仿鑄古錢參差並列，且製作的過程中頻繁地根據圖像來複製古錢，而新仿鑄的古錢，可能再次成爲木模或圖像的來源，而當眞假相參的實物被繪製成圖像加入圖譜中，可能成爲下次再複製的根據。在這些過程中，實物與圖像及模型三者並沒有主從的關係，也不是一個本尊與再現或複製物的關係，而是一個平行且可以相互取代的關係，三者在製作的過程中透過複製，不斷地彼此同步化（Assimulated），最終達到內部的統一。

有趣的是，比起眞古錢與假古錢的區別，乾隆皇帝顯然更重視此種內部系統的全面與統一。因此缺漏的古錢要仿鑄補齊，而且非常強調圖譜與實物錢幣的對應與合併裝匣。令人好奇的是，什麼樣的圖像可以與實物有一個平行相互取代的關係？是任何一種圖像嗎？還是需要某種特別風格的圖像？更直接的

10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匣作〉，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冊 8，頁 335。

問題在於，乾隆三年整理錢幣時，一再倚重的清宮舊藏圖譜與再製的新圖譜究竟是什麼樣的風格？是如武英殿刻本《欽定錢錄》般以傳統譜錄的線圖呈現嗎？還是如冬宮兩盒錢幣所附圖譜般以擬眞風格繪之？我們知道乾隆三年所交出的清宮舊藏《錢譜》，其中至少一冊是活動於康熙雍正朝時的蔣廷錫所作。考慮現存的康熙時期蔣廷錫的《鶺鴒譜》（附圖 10）、[108]或乾隆時期余省與張爲邦所合摹的蔣廷錫《鳥譜》（附圖 11）等，皆使用帶有西洋光影效果之擬眞風格，[109]因此，清宮舊藏蔣廷錫《錢譜》冊頁很有可能也是以類似的風格描繪。[110]另外一個可以證明擬眞圖像在乾隆皇帝早期開始整理宮中藏品中可能就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是「書套款式」裝匣，或侯怡利所說的「冊匣類文物包裝」，在乾隆宮廷的發展。

侯怡利指出同樣是乾隆三年就開始製作的「琳琅司」玉器屜（附圖 12），及開始於乾隆十年（1745）最後改命名爲《西清古鑑》（附圖 13）的銅鏡收藏等，這些裝匣除了運用冊頁外型來進行包裝，且裝飾有各種書畫外，最重要的是，常有對應的擬眞文物圖像圖繪，形成各種器物與書畫交織收納與賞玩空間。[111]因此，作爲乾隆朝這批「冊匣類文物包裝」最早的例子之一，乾隆三年開始整理的《錢譜》冊頁匣，應該也是擬眞風格圖繪譜錄與實物合併裝匣。値得注意的是，如果將此作法與現存的雍正朝描繪各種器物的《古玩圖》並置（附圖 14），[112]雖然也是以擬眞的圖繪來記錄皇家的收藏，[113]然並不若乾隆朝強調實物與圖像的對應關係，兩者的合併裝匣很可能是乾隆朝新創的形式。《錢

---

108 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109 《鳥譜》全部共有十二冊，前四冊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後八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卷 29 期 2，頁 1-75。

110 侯怡利也持相同的看法，見侯怡利，〈匣中的祕密花園──談乾隆時期冊匣類文物包裝〉，《故宮文物月刊》，期 396（2016 年 3 月），頁 94-105。

111 見侯怡利，〈匣中的祕密花園──談乾隆時期冊匣類文物包裝〉，《故宮文物月刊》，期 396，頁 94-105。

112 關於雍正朝《古玩圖》的研究見，Shane McCausland, “The Emperor’s Old Toys: Rethinking the Yongzheng (1723-35) *Scroll of Antiquiti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66 (2001-2002), pp. 65-75.

113 關於《古玩圖》與乾隆朝其他器物譜錄的關係，見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卷 22 期 2（2004 年冬季），頁 133-203。

譜》冊頁匣作爲這個形式的先驅，強調實物與圖像的並置，其中圖像如果眞如推論以擬眞風格繪描，則考慮擬眞風格在乾隆朝的宮廷與現實的指涉密切相關，即解釋了爲何在《錢譜》整理與製作過程中，乾隆皇帝得以不斷地要求工匠由圖譜仿鑄古錢，或由假古錢再製圖譜，任何一者都可以成爲下次再複製的依據。此種擬眞風格所具有的包含顏色、質感、體積等綿密細節，讓「實物」與「圖像」的轉換有一種比起之前線性圖譜更近乎無間隙的關係，也再次肯定《錢譜》製作的例子中，圖像與實物不再是一個物與再現的關係，而是一種對等，且可以彼此取代的存在，雖然兩者都是眞假相參。

這個乾隆三年開始製作的彩繪錢譜與實物的合併裝匣，應該是開始編纂於乾隆十五年且完成於乾隆十六年的武英殿刻本《欽定錢錄》的前身。[114]值得注意的是，其序言中清楚地說到：「內府之藏，周羅几席，按狀成圖，因文攷事，此覆實而有徵，彼憑虛而獨造，相提並論，固自不侔」，[115]亦即此書乃是根據內府所藏而來，因此不同於之前其他相似著作多「憑虛而獨造」，宣稱其「覆實而有徵」。《四庫全書》提要更仔細說明：「是編所錄，皆內府貯藏，得於目睹者爲據，故不特字跡花紋，一一酷肖，即圍徑之分寸毫釐，色澤之丹黃青綠，亦窮形盡相，摹繪逼眞」，[116]提到不僅所錄錢幣皆目睹所來，在花紋與尺寸上力求精確，且在顏色上也「摹繪逼眞」，符合我們對其前身應該有彩繪本的推論。諷刺的是，如果《欽定錢錄》眞的是以上述《活計檔》於乾隆三年即開始整理的古錢與圖錄爲基礎，事實上有許多僅是根據圖像虛構仿製的古錢，怪不得民國初年錢幣專家丁福保認爲其「沿誤踵謬，附會失實」。然而，爲何《欽定錢錄》卻還是大言不慚以一手「目睹者爲據」與「覆實而有徵」來自我

114 此應該像同時期製作的《皇朝禮器圖式》的例子一樣，在現行的刻本之前，應該有像冬宮這兩盒錢幣所附圖譜一樣以擬眞法描繪的彩繪本，可惜現在不存。關於彩繪本的介紹，見劉潞，〈一部規範清代社會成員行爲的圖譜——有關《皇朝禮器圖式》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 年第 4 期，頁 130-161；苑洪琪，〈清宮大典與午門儀仗〉，《紫禁城》，2005 年第 3 期，頁 136-145。

115 〔清〕梁詩正、蔣溥等謹序，〈序〉，《欽定錢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4，頁 3。

116 〔清〕紀昀、陸錫熊等總纂，〈提要〉，《欽定錢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4，頁 2。

標榜？這個問題帶我們回到之前對於冬宮那兩盒錢幣的一系列問題，包括爲何此兩冊乾隆宮廷製作的錢幣圖譜亦是採用擬眞圖繪風格？以及爲何乾隆皇帝堅持要將宮中新仿鑄的回子錢放到照理說是西域進呈的錢幣中呢？

《欽定錢錄》對於「徵實」的標榜與實際內容的出入，讓人想到約略同時編纂之《獸譜》的個案，一樣宣稱以一手調查的「徵實」材料爲本，然事實上很多圖像卻是直接轉引自《山海經》或《三才圖繪》等傳統類書。我之前的研究指出，此際宮廷對於「幻（假）」與「眞（實）」辯證充滿興趣。[117]除了視覺的樂趣外，尤其在乾隆宮廷，以西洋擬眞技法描繪出來之「圖像的眞實」往往被要求視同於「現實的眞實」，因此《獸譜》中同樣以強調視覺幻法的西洋折衷法所描繪的瑞獸「麒麟」、想像性的生物「開明獸」、宮中飼養的「良馬」、或遠方來的「鼻角獸」，牠們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差別，透過西洋擬眞所傳達出的「徵實」感，就像「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的例子一樣，乾隆皇帝得以虛擬實境回應中國傳統統治之種種命題，進而成就其統治的理想「現實」。[118]就宮中整理古錢與《錢譜》的例子而言，正如《欽定錢錄》序言所言：「以編年之法行之，要使世次相承，瞭如指掌……一展卷，而列朝政事之大端，畢著於此」，[119]宮中錢幣的收藏與編纂乃是意圖在以編年建立朝代興衰起落之歷史，因此對乾隆皇帝來說，得其「全」非常重要，因爲唯有如此，才能如錢維城的恭和詩所言「裒億千年在範模」。爲了全此一系相承的譜系，除了透過補鑄缺失的古錢外，考慮西洋擬眞風格在乾隆朝的脈絡，正如開始製作於乾隆十五年的《獸譜》、《鳥譜》與《職貢圖》例子，其中充滿細節與質感描繪的「圖像的眞實」，意圖以圖像建立一個「現實的眞實」，而此「現實的眞實」常常

[117] 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爲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0，頁 1-75。

[118]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1-76；同作者，〈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爲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0，頁 1-75。

[119] 〔清〕梁詩正、蔣溥等謹序，〈序〉，《欽定錢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4，頁 3。

是以圖像逼真地活化中國傳統典範或系譜。[120]這也讓我們想到 Patricia Berger 指出乾隆皇帝指示丁觀鵬仿製的不管是《大理國梵像圖卷》或《文殊像軸》，都是在古老的形式上加上具有擬眞幻影之描繪，乾隆皇帝不但要求傳教士傳來的新技法在復古的典範中注入血肉，且認爲這些新的複製比起仿製的對象更爲「眞實」。[121]乾隆皇帝構思宗教圖像的例子似乎與其理解現實世界的各種譜類圖像的邏輯沒有很大差別。換句話說，《錢譜》的編輯即使摻雜了新仿的古錢，或者整套都是新複製的古錢，然而只要伴隨擬眞的圖譜，這些錢幣在宮廷的視覺文化中即被以「現實的眞實」來理解。對於乾隆皇帝來說，透過擬眞圖像所展示之一脈相傳帝王系譜之「現實」，比起其中是否含有仿鑄甚至僞造的古錢，無疑地更爲關鍵與重要。

乾隆皇帝送給凱薩琳女王的外交禮物？

回到裝盛西域上呈錢幣的這兩盒命名爲「泉極歸流」與「古鈇遠至」的錢匣，乾隆皇帝爲何要宮中仿鑄回子錢，且將其放回「泉極歸流」盒中，並與「眞的」回子錢並置？其中除了可能爲了全其數字「三十二」外，也可能像雍正自豪於宮中製造出仿造以假亂眞的假寶石，或乾隆朝大量仿造清宮的六世班禪贈送的禮物，[122]製作紫金琍瑪無量壽佛像等，皆有一種技術競爭較勁的意味。而

120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1-76；同作者，〈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卷 29 期 2，頁 1-75；同作者，〈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爲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0，頁 1-75。

121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特別是第二章“Pious Copies”.

122 前者見吳美鳳，〈假作眞時眞亦假：從養心殿造辦處活計檔看盛清時期清宮用物之「造假」〉，收入王爾敏教授八秩嵩壽榮慶學術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史學與史識：王爾敏教授八秩嵩壽榮慶學術論文集》（中和：廣文書局，2009），頁 215-270。後者見羅文華，〈宮廷與西藏：乾隆時期藏佛教銅法物加工技術之選擇與引進〉，收入故宮博物院與柏林馬普學會科學史所編，《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221-276；同作者，《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下冊，頁 399-412；同作者、文明，〈謎一樣的紫金琍瑪〉，《紫禁城》，2014 年第 5 期，頁 87-111。

以宮中的工坊重鑄西域原有的錢幣，也許就像乾隆皇帝對普爾錢的改制一樣（在原來回子錢上正面鑄印「乾隆通寶」，背面則以滿文與維吾爾文標示鑄造地方，例如阿克蘇等），證明宮廷的力量不僅可以輕易地全面掌握且複製此剛征服區域的錢幣，更可以透過貨幣的改制，將新的年號印鑄在上，重鑄此片疆域，此正是王際華匣側恭和詩所云：「西來銀鏤勒成功，圜法欣隨職貢通」。[123]對於這樣一件代表乾隆皇帝平定新疆戰功且已放置在紫光閣的戰利品，乾隆皇帝有可能送給凱薩琳女王作爲禮物嗎？然或考慮錢幣在清宮頻繁地複製，冬宮這兩匣錢幣是否也有可能爲原來平定西域上繳錢幣裝匣而成的兩匣錢幣之複製品？如果眞是如此，則匣內高度擬眞的圖像描繪就更形不可或缺，正如上述已經說明此類擬眞圖像如何在宮中與現實連接，因此這些仿製的「原件」是有可能透過圖譜上那些擬眞圖像的描繪，驗證彼此存在的眞實性。換句話說，可以視覺及物質複製的方式確定這些眞假相參「古錢」存在性的眞實性。

乾隆皇帝眞的有可能送禮物給凱薩琳女王？清廷通常依照「物有所償，貢有所賞」的原則，對於各方的進貢皆會給予適當的賞賜，其中當然也包括歐洲傳教士或使節團。[124]除此常例外，清廷也不乏主動贈禮給他國君王的前例，最有名的例子即是 1693 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派遣法國傳教士白晉爲清廷特使回到法國招募傳教士一事，[125]即帶去一批康熙送給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的禮物，其中比較確定的有 49 冊裝潢精緻的中國典籍。[126]白晉此次回去覲見路易十四，就像冬宮那兩匣錢幣沒有函附任何正式外交文書（冬宮館員一說遺失），同樣沒有攜帶任何清廷國書，也沒有任何正式外交文件，白晉因此還花了很大力氣跟路易十四解釋此如何是康熙刻意的安排，因爲一旦有正式文書，中國不可避免地必須將法國視爲中國的屬國。不管實情爲何，就康

123 出自盒冊王際華恭和詩，見附錄一。
124 關於清廷的貢與賞，見何新華，《清代貢物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125 許明龍、韓琦，〈康熙的洋欽差——白晉〉，收入許明龍主編，《中西文化交流先驅》（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頁 174-189；Claudia von Collani, ed., *Joachim Bouvet, S. J. Journal: des voyages*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5), pp. 35-36.
126 Monique Cohen, “A Poi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Books Presented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in Paris by Joachim Bouvet, S. J., in 1697,” *Chinese Culture, A Quarterly Review*, 31:4, pp. 39-48.

熙朝白晉的例子看來，即使冬宮二匣錢幣沒有外交文書，也無法直接排除其作為一個外交禮物的可能。

如果兩匣錢幣確實如冬宮所堅持為外交禮物，那有可能在什麼樣的時機，以什麼樣的途徑，送給俄國？由於兩匣錢幣的「原件」要到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與十二月才裝匣完成，而乾隆二十五年左右事實上正是中俄關係非常緊張之際，不但 1763 年（乾隆二十八年）5 月 25 日至 6 月 21 日，兩國曾在恰克圖舉行邊界會議，試圖解決諸多問題，包括邊境發生案件問題，俄國在邊境私自設置木樁侵佔中國領土，及俄國人在恰克圖的收稅問題等。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乾隆朝的中俄關係早在乾隆皇帝征準部之際，俄國收容許多準部潰逃之眾即已引起清廷不滿，這些種種衝突最後終於導致乾隆二十九年恰克圖中俄貿易停市。[127]值得注意的是，1762 年（乾隆二十七年）俄國伊麗莎白女王駕崩，彼得三世〔Пётр III Фёдорович（Peter III）, 1728-1762〕宣告即位，於 4 月 22 日曾經敕令俄國外務委員會以樞密院的名義派員前往北京，向清廷理藩院遞交關於他繼承皇位的公函，近衛軍退伍中尉伊萬・克羅波托夫〔И. И. Кропотов（Ivan Ivanovich Kropotov）, 1724-1769〕被選派為信使。除了兩件正式公函，俄國宮廷並發給克羅波托夫一項秘密指令，要求克羅波托夫向皇帝近臣暗示，俄國擬派出一個顯貴的使團前往中國，訂立兩國間永久條約，消除一切關於雙方邊界案件的爭議。派出使節團的條件是，中方也要保證派出相對等的使團，同時還命令克羅波托夫不能接受送給俄國皇帝任何禮物，要其轉告中方，禮物要由中國信使送去比較體面。克羅波托夫接受此任務後，立刻從聖彼得堡前往莫斯科，但因病停留幾個星期，在此期間，凱薩琳女王繼承了皇位（6 月 28 日），因此前述公函收回改寫皇帝名號，過去的秘密指令也不再有效。1763 年 4 月 29 日克羅波托夫終於動身出發，期間見到了包括傅恆等大臣，同時也覲見乾隆皇帝，最後於 8 月 12 日離開北京。[128]雖然克羅波托夫的北京之

127 張維華、孫西，《清前期中俄關係》（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頁 294-295。

128 見〔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議，《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343-350。

行並沒有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其回國之後，清廷理藩院與俄方樞密院更因兩國的頭銜等有許多爭執，例如寫於乾隆二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的理藩院信函就對俄方在之前公函將俄國稱為幅員廣大和偉大的國家感到不滿，認為只有中國才能被尊為真正幅員遼闊與偉大的國家。[129]最後清廷並於乾隆二十九年關閉恰克圖貿易。[130]凱薩琳女王還是希望恢復以往的和好關係，乾隆三十二年（1767）再度派出之前出使過中國的克羅波托夫前往北京，乾隆四十五年（1780）恰克圖貿易再度開放。冬宮的這兩盒錢幣是否是乾隆皇帝送給凱薩琳女王即位的禮物，並由克羅波托夫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出使北京後帶回俄國？由於沒有具體的檔案資料，我們無法確定。可以確定的是，由上述即使非常片段的兩方往來公文書看來，中俄此際不僅有現實上邊界與領土的爭議問題，在象徵層面上，清廷對於誰才有權稱自己為幅員廣闊的國家也極為在意。冬宮的這兩盒錢幣，內含從新疆這片新征服的土地來的中國古錢、當地錢幣與實際參與此次征戰人員的奏摺，最後再覆蓋在刻有讚頌此片疆域如何在天命下歸為清廷治下的御製詩與群臣恭和詩的匣盒，將其送給長期以來在此區域競爭影響力的俄國宮廷似乎再恰當也不過。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前述中國有一個非常長遠收藏與品評錢幣的歷史，然而將其做為外交禮物卻是非常不尋常之事。相反的，在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宮廷的脈絡中，收藏錢幣與由錢幣發展出來的紀念勳章卻是各國宮廷間非常盛行的文化活動，錢幣與勳章被認為是記錄重要歷史事件與統治的重要證據，對其的收藏被視為「王公貴族的英雄式的行為」（“heroic actions of princes”）。[131]因此有教養的各國王公貴族都應該有所參與，例如法王路易十四與剛即位的凱

[129] 見〔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頁 352。

[130] 關於恰克圖的中俄貿易，見賴惠敏，〈十九世紀恰克圖貿易的俄羅斯紡織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9（2013 年 3 月），頁 1-46。

[131] Robert Wellington, *Antiquarianism and the Visual Histories of Louis XIV: Artifacts for a Future Past* (Surrey, UK, Burlington, USA: Ashgate, 2015), p. 7.

薩琳女王都是著名的錢幣收藏家。[132]其中法王路易十四尤其重要，其不僅是重要的錢幣收藏家，且支持出身於里昂（Lyon）的耶穌會教士 Claude-François Ménestrier（1631-1705）提議以錢幣與勳章來書寫當代王朝統治史，藉此將路易十四視爲希臘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古物熱或復古主義（antiquarianism）雖然是整個歐洲近代早期（大約 1500-1800）的普遍現象，但是研究路易十四錢幣收藏的學者 Robert Wellington 認爲 Ménestrier 以此來書寫當代史，卻是一個全新的嘗試。[133]值得注意的是，Ménestrier 爲路易十四所編纂的 *Histoire du règne de Louis le Grand par les médailles, emblêmes,...,* 也在記載清季北京四大教堂——南堂、東堂、北堂、西堂——藏書的《北堂書目》中，[134]上面有“PP Gallor S J Pekin,” 此爲“PP. Gallorum Societatis Jesu Pekin”的縮寫，爲舊北堂收藏之印記。[135]雖然我們不確定此書收入北堂的時間，但是乾隆朝《錢譜》與最後刻本《欽定錢錄》的編纂與傳統錢譜形式的改寫，的確有許多同時期歐洲宮廷文化的影子，其中包括《欽定錢錄》將傳統以品類爲中心的泉譜編纂改成「編年之法行之」，強調「世次相承」，意圖以錢幣書寫歷史並與《通典》《通考》相互應證，[136]即與上述 Claude-François Ménestrier 爲路易十四所編纂的王朝史非常類似。另外，就錢幣收藏的形式而言，乾隆朝所發展出來的不管是乾隆朝初年《錢譜》所採用模仿冊頁形式的「冊匣式」，或是冬宮兩匣錢幣所使用的「罩蓋式」，都似與傳統有別。傳統泉家究竟如何收藏錢幣，留存的記錄很少，比較多記載的多爲乾嘉以後，例如，清末李佐賢的《續泉說》或民國初年丁福保的《古錢大辭典》都記載許多當代狂熱泉家的行徑。李佐賢提到惜泉如命的馮

[132] 關於凱薩琳女王的錢幣收藏，見 Evgenija S Ščukina, “Le medaglie,” *Caterina di Russia : l'imperatrice e le arti* (Milano: Electa, 1998), pp. 159-163.

[133] Robert Wellington, *Antiquarianism and the Visual Histories of Louis XIV: Artifacts for a Future Past*, p. 2.

[134] 此書的初版爲 1689 年，北堂圖書館所收爲 1700 年的版本，見 Lazarist Mission, Peking,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eking: Lazarist Mission Press, 1949, 重印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p. 134.

[135] Lazarist Mission, Peking,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 xvii.

[136] 〔清〕梁詩正，蔣溥等謹序，〈序〉，《欽定錢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4，頁 2-3。

晉漁曾「攜古泉佳品一串」去參加金石名家葉東卿家的宴會，[137]丁福保也記載另一藏泉家方爾謙將其「藏錢之堅好者，以絲索貫之，分數十貫，輪日以十餘貫，纍纍實衣袋中」，[138]終日將錢繫在腰間不離身。除了纏錢成串外，當然散置篋中，或講究一點，以線穿縛縫於硬襯紙上，再放於篋中，也是很常見的。[139]然而乾隆宮廷的「冊匣式」或「罩蓋式」與這些很可能有一個傳統根源的民間藏泉方式都顯得很不同。乾隆宮廷的形式讓我們想到同時期歐洲收藏錢幣的方式，例如神聖羅馬帝國的 Charles VI 所收藏羅馬金幣的 *Codex Aureus,* 或是 André-Charles Boulle（1642-1732）幫法國 Prince of Condé 所作的勳章收藏匣（附圖 15）。前者為仿書冊的形式，後者則是內有層屜的硬木匣的形式。關於乾隆朝錢幣收藏新形式與歐洲的關係，需要另撰論文闡述之，但是歐洲宮廷將錢幣收藏作為建構歷史的重要證據卻是事實，尤其在重要外交事件中，以發行紀念章來見證歷史事件，更是屢見不顯，[140]而由《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所看到乾隆皇帝與蔣友仁等傳教士各種問答看來，[141]乾隆皇帝是有可能知道歐洲宮廷與錢幣相關的作法，因此乾隆皇帝是否採用了一個其對手可以理解的媒材與作法來宣示其疆域主權，這是非常值得考慮的。

結論：十八世紀的全球化國際宮廷文化？

乾隆皇帝到底是否曾經將作為征服西域戰功見證的兩盒錢幣送給凱薩琳女王？即使由宮廷作坊頻繁複製錢幣收藏的做法與兩匣錢幣成立之乾隆二十四年中俄關係脈絡來考察，雖說不無可能，然不可否認地，紫光閣的陳設檔清

---

137 〔清〕鮑康撰，〔清〕李佐賢撰，《觀古閣泉說一卷．續泉說一卷》（《觀古閣叢刻》本），收入江慶柏主編，《中國歷代譜錄文獻集成》（合肥：黃山書社，2017），冊 12，器用之屬，頁 7744。

138 丁福保，〈近代古錢家與譜錄〉，《古錢大辭典》，總論，13 下，頁 2266。

139 見丁福保，〈近代古錢家與譜錄〉，《古錢大辭典》，總論，4 下，頁 2248。

140 法王路易十四尤其善於利用收集與發行紀年章來為其塑造個人形象，各種例子見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2).

141 呂一民、沈堅、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楚地記載直至同治元年紫光閣武成殿都還陳設與兩匣同名的作品，因此除非有另外同名錢匣的出現，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此疑問的真正答案。然而不管如何，可以確定的是，正像盒內所附奏摺諸詞臣所言，此準部與回部所構成的新疆，「初非列版圖而通泉貨也」，以前雖然不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卻已經流通中國的貨幣，況且「今日德威遐鬯，纏頭冒帍之輩咸兢兢奉尺一為臣僕」，透過錢幣的改制，此區域早已「煥我同文」。透過盒內那些以歐洲擬眞技法將實物光影與質感描繪得幾乎觸手可及的圖像，內附的參與此疆域征戰人員之一手報告，以及直接從此區域送來或發掘出的古代實物，這兩匣錢幣可說是讓人身歷其境地以空間與時間的向度展現了乾隆皇帝在此新征服疆域不可爭論的主權。更重要的是，此兩盒包含被征服的人民與土地所進貢的錢幣，最後與各種戰爭相關文物，包括告成碑文、各種慶功宴席紀錄、地圖、武器、盔甲戰袍、功臣圖、各種形式的戰圖等，一起陳設在紫光閣。

近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對於紫光閣的陳設有相當精彩的重建，紛紛指出其為「軍事博物館」（Military Museum）或「帝國武勳的展示空間」，[142]然而沒有點出的是，這種展示空間與相關大型貼落的製作（不僅是銅版畫戰圖），很可能是乾隆朝一個新創舉，與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視覺傳統有密切的關係。歐洲在文藝復興晚期從歐洲北部開始出現以視覺形式記錄戰爭的傳統，其形式包括大型的掛毯、裝置在宮殿空間中的壁畫面板（fresco panels）等，至少在十六世紀早期的歐洲，描繪戰爭場景的繪畫已經變成一個成熟的畫科（genre），[143]而這些大型繪畫的製作，也與歐洲宮殿常見的戰功室（War Room）或軍械陳列室（Armoury）等與戰爭有關的陳設傳統密不可分。最有名的當然是 1837 年拿破崙時代才在凡爾賽宮裝置的 The Gallery of Great Battles（附圖 16），其長型的空間兩側繪製如紫光閣《呼爾滿大捷戰圖》大型貼落般的巨幅戰圖（附

142 前者見 Hui-chun Y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pp. 216-225, 後者見馬雅貞，《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第四章，頁 163-195。

143 關於歐洲戰爭圖的傳統，見 Simon Pepper, "Battle Pictures and Military Scenes," published in 2003 in *Oxford Art Online*, http://www.oxfordartonline.com/（2018 年 2 月 3 日檢索）。

圖 17），[144]共 33 幅，描繪法國歷史中重要的戰役，廳中並擺設在戰爭中犧牲的軍官的半身塑像等。雖然此戰役室較乾隆紫光閣的時間要晚，但是這樣的空間在歐洲是有一個傳統，例如目前歐洲唯一一個原地原樣保存的十六世紀收藏的 Ambras Castle, 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德南一世（Ferdinand I, 1503-1564）送給其第二個兒子斐德南二世大公（Ferdinand II, 1529-1595）的領地，其中就有二間以時代順序陳列專門展示武器、盔甲、肖像的軍械陳列室（附圖 18）。[145] 值得注意的是，其不但像紫光閣的陳設，有戰爭相關武器與文物的展示，例如，重要戰役指揮官的盔甲（Armors and Arms of famous commanders），也展示來自長期與哈布斯堡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處於戰爭狀態的土耳其的盾牌與刀箭等戰利品（附圖 19）。但是與紫光閣不同的是，這些文物很多是斐德南二世大公特意收集來的，而非親身經歷，其欲以這些物件來紀念重要的歷史事件（除了戰爭，也包括皇家典禮與宴會）與在這些事件中傑出的個人等。即使是乾隆皇帝可能知道的路易十四，在接待使節與舉行正式典禮的凡爾賽宮鏡廳（The Hall of Mirrors）中，也在天花板繪製了三十幅呈現路易十四統治政績的大型畫作，其中就包含有八幅描繪對荷蘭作戰的戰圖，而在鏡廳兩端的「戰爭廳」（War Room）與「和平廳」（Peace Room），則更進一步以戰爭與和平的裝飾主題強調帝國的勝利感。[146]將此歐洲脈絡與乾隆皇帝所主導包裝的回疆上呈兩匣錢幣及其陳設並置觀察，其中所透露出諸多相似與可能關聯之處，雖然還需進一步深入研究與闡述，然而不管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乾隆皇帝眞的送出此禮物，其中所蘊含的政治訊息是凱薩琳女王也會了解的，因爲這確實是歐洲宮廷文化所嫻熟的政治語彙與操作。總之，對於回答乾隆皇帝究竟是否曾經送了兩匣回疆錢幣給熱愛錢幣收藏的凱薩琳女王，這可能是一篇無解的論

144 此藏在柏林漢堡民俗博物館的巨型貼落，根據馬雅貞的重建，很可能即是乾隆二十五年安置於紫光閣的〈瑪瑺得勝圖〉，見馬雅貞，《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頁 171。

145 賴毓芝，〈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收藏的一些思考〉，《故宮文物月刊》，期 276（2006 年 3 月），頁 106-118；Alfred Auer, Veronika Sandbirchler, Karl Schütz, and Christian Beaufort-Spontin, *Ambras Castle* (Milan/Vienna: Electa/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2000), pp. 16-29.

146 見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Chapter 7.

文，但是其中所交織複雜的錢幣收藏、製作、陳設與流通的歷史，讓我們看到十八世紀的清宮在很多面向上是了解且甚至挪用許多歐洲宮廷的政治、物質與視覺語彙來溝通統治的重要議題，絕非僅是皇帝個人的娛樂與獵奇可以概括。[147] 此值得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十八世紀是否可能有一個包含歐洲、俄羅斯、甚至東亞的全球化國際宮廷文化的形成，而清宮也是其中重要的成員？

[147] 如康無為所言，見康無為（Harold Kahn），〈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與異國奇珍〉，《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37-72。

附錄一　匣盒側邊四面群臣恭和詩

第一面：

西戎即敘奏殊功，鹽澤泉源玉府通，絕域貿遷徵品異，皇朝正朔表文同，流傳漫紀漢宋唐，則壤仍分上下中，再譜西清錢錄後，遐哉聲教仰宸躬。臣錢汝誠恭和。二印「臣」「誠」。

試向洪鑪驗化功，蒲昌不脛貨泉通，嚕斯一自聯殊域，普爾從茲奉大同，二十七品歸陶鑄，裏億千年在範模，中感摩古貿懷疇，致福由來自聖躬。臣錢維城恭和。二印「臣」「城」。

第二面：

遐荒納賮荷神功，重譯欣看貨布通，利用不妨從俗更，鑄文要識紀元同，金繒昔致三邊外，贄幣今歸九府中，國寶從茲傳更遠，聲靈式仰一人躬。臣梁詩正和。一印「臣正」。

典屬天方定賦功，一奩赤仄笵文通，國書近喜皇朝稟，歲幣遙嗤異代同，古鑒因徵圜法上，邊情可識算緡中，題成篋衍賤新譜，德致常昭今勑躬。臣劉綸恭和。二印「臣」「綸」。

第三面：

洱海銘垂底定功，旋收普爾致和通，旁行略比三銖小，圜法全歸九府同，遠共飛蚨來徼外，都成編貝入函中，輪縿往事嗤唐宋，今日纏頭盡鞠躬。臣余敏中恭和。二印「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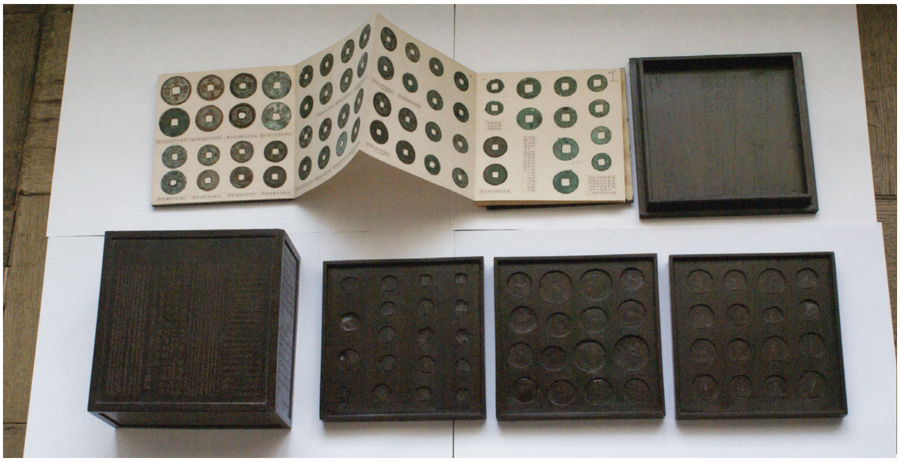
西來銀鏤勒成功，圜法欣隨職貢通，新譜更添三旋樣，古文猶見五銖同，光騰寶字陶鎔後，櫛比瑤函次第中，因利任教權子母，風薰財阜仰皇躬。臣王際華恭和。二印「臣」「華」。

第四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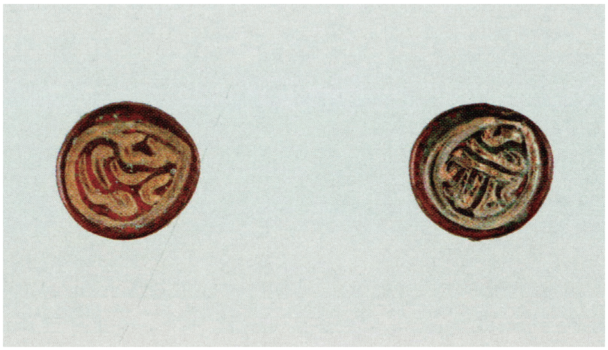
西域全歸即敘功，還看騰格貨泉通，遐方永識君臣義，圜法仍較子母同，往代職方琛賮外，清時聲教範模中，從今玉府收蒲海，不數塗山穀與躬。臣蔣溥恭和。二印「臣」「溥」。

底績西戎敘九功，�沖泉貨漸開通，何年昉製挑為様，歷代兼收篆峇同，豈是青蚨去復返，也隨白帽外歸中，利民鑑古天王意，都護平均勵匪躬。臣劉統勳恭和。一印「臣勳」。

附圖 1　「古錢三十二枚泉流歸極錢譜一冊」（此採《紫光閣武成殿陳設》登錄名）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 Rus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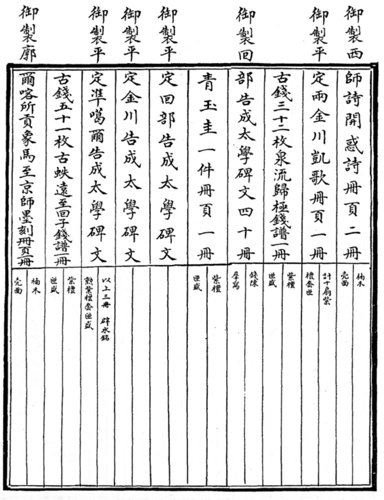
附圖 2　「古錢五十一枚古蚨遠至回子錢譜一冊」（此採《紫光閣武成殿陳設》登錄名）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 Russia



附圖 3　準噶爾普爾錢，直徑 1.6 公分，重 7.7 克，吐魯番博物館藏，收入吐魯番博物館與吐魯番學研究所合編，《吐魯番博物館藏歷代錢幣圖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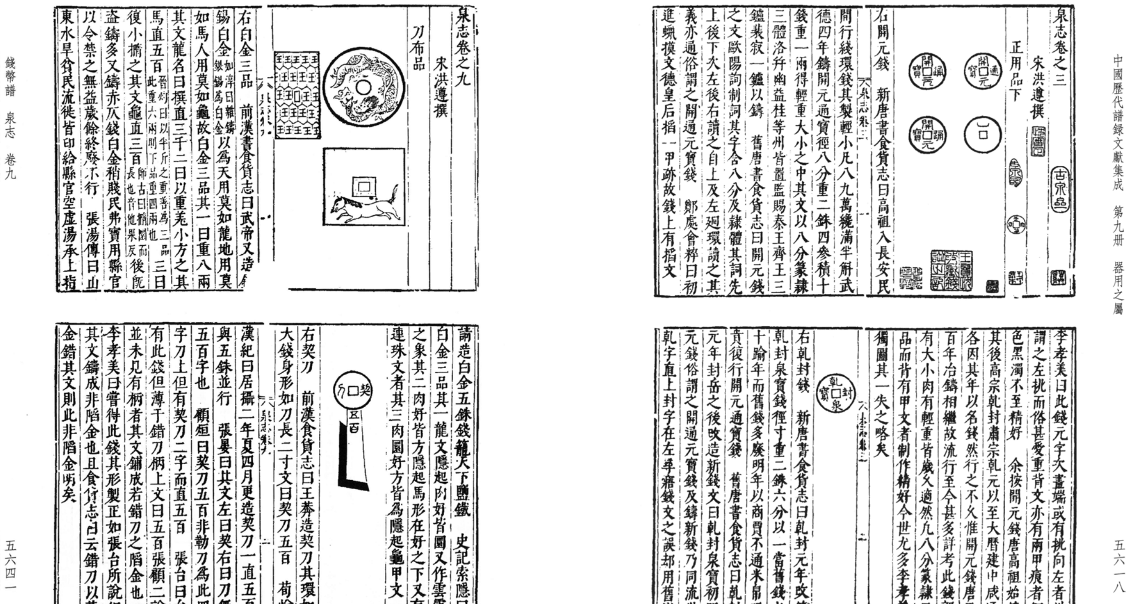
附圖 4　乾隆通寶　葉爾羌局，直徑 2.1 公分，重 6.85 克，吐魯番博物館藏，收入吐魯番博物館與吐魯番學研究所合編，《吐魯番博物館藏歷代錢幣圖錄》，頁 40。

附圖 5　〔清〕謝遂《職貢圖》第一卷（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御製西師詩闢惑詩冊頁二冊
御製平定兩金川凱歌冊頁一冊
古錢三十二枚泉流歸極錢譜一冊
御製回部告成太學碑文四十冊
青玉圭一件冊頁一冊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古錢五十一枚古蚨遠至回子錢譜一冊
御製廓爾喀所貢象馬至京師墨刻冊頁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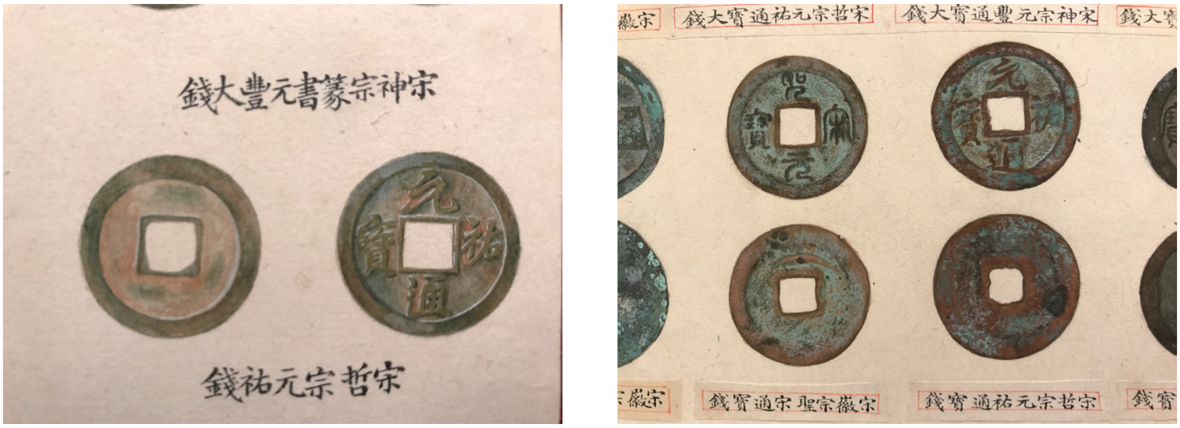
附圖 6　〈武成殿陳設〉（同治元年[1862]）《紫光閣武成殿大檔一部》，卷 1，收入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南海檔案》（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冊 23，頁 9。



泉志卷之九
宋洪遵撰
刀布品
右白金三品　前漢書食貨志曰武帝又造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其文龍名曰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盜鑄多又鑄赤仄錢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　張湯傳曰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五銖錢籠天下鹽鐵　史記索隱曰白金三品其一龍文隱起肉好皆圜又作雲霞之象其二肉好皆方隱起馬形在好之下又有連珠文者其三肉圜好方皆為隱起龜甲文
右契刀　前漢食貨志曰王莽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荀悅漢紀曰居攝二年夏四月更造契刀一直五百與五銖並行　張晏曰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　顧烜曰契刀五百非勒刀為此四字刀上但有契刀二字而直五百　張台曰台有此錢但薄于錯刀柄上文曰五百張顧二說並未見有柄者其文鋪成若錯刀之陷金也　李孝美曰嘗得此錢其形製正如張台所說但其文鑄成非陷金也且食貨志曰云錯刀以黃金錯其文則此非陷金明矣

泉志卷之三
宋洪遵撰
正用品下
右開元錢　新唐書食貨志曰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裴寂一鑪以鑄　舊唐書食貨志曰開元錢之文歐陽詢制詞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鄭虔會粹曰初進蠟様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李孝美曰此錢元字次畫端或有挑向左者世謂之左挑而俗甚愛重背文亦有兩甲痕者銅色黑濁不至精好　余按開元錢唐高祖始鑄其後高宗乾封肅宗乾元以至大曆建中咸通各因其年以名錢然行之不久惟開元錢唐三百年治鑄相繼故流行至今甚多詳考此錢郭有大小肉有輕重皆歲久適然凡八分篆隸三品而背有甲文者制作精好今世尤多李孝美獨圖其一失之略矣
右乾封錢　新唐書食貨志曰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　舊唐書食貨志曰乾封元年封岳之後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初開元錢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卻用舊錢

附圖 7　〔宋〕洪遵，《泉志》（明萬曆刻《秘冊彙函》本），卷 9，收入江慶柏主編，《中國歷代錢譜錄文獻集成》（合肥：黃山書社，2017），冊 9，頁 5641（左）、5618（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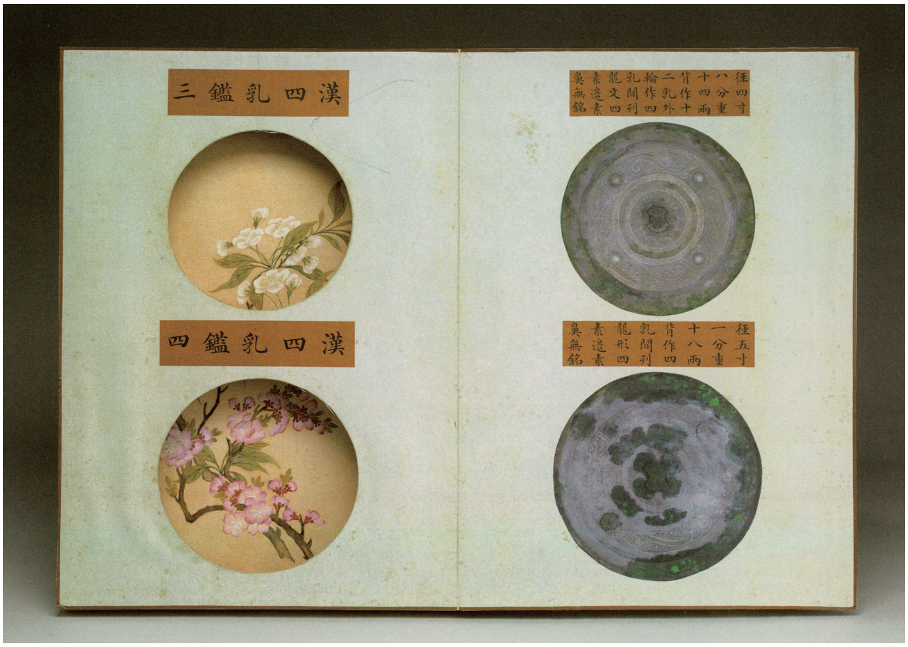
附圖 8　（左）「泉流歸極」錢譜（局部）　　（右）「古䄁遠至」錢譜（局部）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 Russia

附圖 9　（左）〔清〕余省、張為邦，〈開明獸〉，《獸譜》，冊 6，第 6 開　1761　絹本設色，40.2 公分 x 42.6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右）〔清〕余省、張為邦，〈旋毛馬〉，《獸譜》，冊 3，第 1 開　1761　絹本設色，40.2 公分 x 42.6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附圖 10　〔清〕蔣廷錫，〈黑哆囉玉翅〉，《鵓鴿譜》，上冊，第 11 開，絹本設色，40 公分 x 40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宮鵓鴿譜》（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 31。

附圖 11　〔清〕余省、張為邦，〈小灰鶴〉，《鳥譜》，冊 1，第 7 開 1761 絹本設色，41.1 公分　x 44.1 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附圖 12　〔清〕乾隆朝「琳琅司 五色相宣」玉器屜，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收入澳門藝術博物館編，《金相玉質：清代宮廷包裝藝術》（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0），頁 129。



附圖 13　〔清〕乾隆朝「西清續鑑 乙編 第九冊」鏡匣，收入吳曉筠主編，《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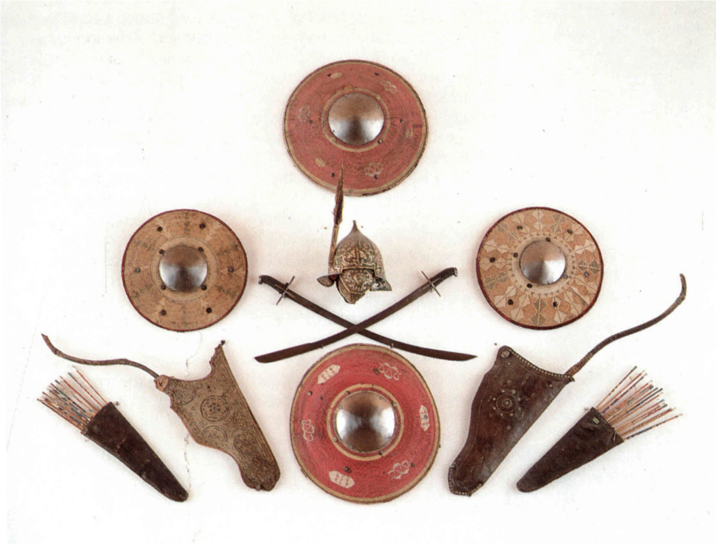
附圖 14　《古玩圖》雍正六年紀年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藏 現寄存於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附圖 15　（左）*Codex Aureus*, 1714 紀年，神聖羅馬帝國 Charles VI 的收藏，Vienna, KHM, Münzkabinett, Inv. No .: 5381, 收入 Elisabeth Hassmann, *Numophylacium Imperatoris : das Wiener Münzkabinett im 18. Jahrhundert*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6), p. 20.
（右）André-Charles Boulle (1642-1732) 幫法國 Prince of Condé 所作的勳章收藏箱，法國國家圖書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附圖 16　One of the first autotypes of the Galerie des Batailles in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France, historical photograph, 1884.

附圖 17　〔清〕呼爾滿大捷戰圖右半部殘片 1760 年 原陳設於紫光閣，現藏 Ethnological Museum of Hamburg（根據殘片重建原件尺寸應為高 400 公分 x 長 800 公分，見 http://www.battle-of-qurman.com.cn）此圖引自 http://masterpieces.asemus.museum/masterpiece/detail.nhn?objectId=12469 .

附圖 18　Baroque Armoury with Wooden Ceiling by Giovanni Battista Fontana, 1576, Ambras Castle, Innsbruck, Austria，出自 Alfred Auer, Veronika Sandbichler, Karl Schütz,and Christian Beaufort-Spontin, *Ambras Castle* (Milan/Vienna: Electa/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2000), p. 26.



附圖 19　土耳其戰利品：圓形盾牌，弓箭，劍囊等，十六世紀中葉，出自 Alfred Auer, Veronika Sandbichler, Karl Schütz, and Christian Beaufort-Spontin, *Ambras Castle*, p. 23.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劉安著，〔清〕茆泮林輯，《淮南萬畢術》，收入《淮南萬畢術外四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清〕于敏中，《素餘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清〕翁樹培，《古泉彙考》，下冊，重印於《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匯刊》，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4。

〔清〕張穆，《蒙古游牧記》，臺北：蒙藏委員會，1980。

〔清〕梁詩正、蔣溥等，《欽定錢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4。

〔清〕傅恆，《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03。

〔清〕傅恆等編，《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59。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錢維城，《鳴春小草》，《錢文敏公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4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鮑康撰，〔清〕李佐賢撰，《觀古閣泉說一卷‧續泉說一卷》（《觀古閣叢刻》本），收入江慶柏主編，《中國歷代譜錄文獻集成》，冊 12，合肥：黃山書社，2017。

〔漢〕孔氏撰、〔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南海檔案》，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呂一民、沈堅、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Lazarist Mission, Peking,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eking: Lazarist Mission Press, 1949, 重印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Pepper, Simon. “Battle Pictures and Military Scenes,” published in 2003 in *Oxford Art Online,* http://www.oxfordartonline.com/ （2018 年 2 月 3 日檢索）。

二、專著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議，《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丁福保，《古錢大辭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2。

王永生，《錢幣與西域歷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

王德泰，《清代前期錢幣制度型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江慶柏主編，《中國歷代錢譜錄文獻集成》，冊 9，合肥：黃山書社，2017。

何新華，《清代貢物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林士鉉，〈同文之盛：以滿州文字寫蒙古語文〉，《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

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馬雅貞，《刻劃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張維華、孫西，《清前期中俄關係》，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2。

澳門藝術博物館編，《金相玉質：清代宮廷包裝藝術》，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0。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Alekseev, V. *Numizmaticheskaya Kollektsiya Bogdokhana Tsyan' Luna.* (Numismatic Collection of Emperor Qianlong), St. Petersburg: Printing house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06.

Auer, Alfred, Veronika Sandbichler, Karl Schütz, and Christian Beaufort-Spontin, *Ambras Castle.* Milan/Vienna: Electa/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2000.

Berger, Patricia.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Burke, Peter.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2.

Hartill, David. *Qing Cash*. London: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2003.

Hassmann, Elisabeth. *Numophylacium Imperatoris: das Wiener Münzkabinett im 18. Jahrhundert.*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6.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Ščukina, Evgenija S. “Le medaglie.” *Caterina di Russia: l'imperatrice e le arti* (Milano : Electa, 1998), pp. 159-163.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ed. *Dary Vostoka i Zapada Imperatorskomu dvoru za 300 let: katalog vystavki.* (Gifts from East and West to the Imperial Court over 300 years: exhibition catalogue), Sankt-Peterburg : Izdatelʹstvo Gosudarstvennogo Ėrmitazha, 2014.

von Collani, Claudia, ed. *Joachim Bouvet, S. J. Journal: des voyages.*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5.

Wellington, Robert. *Antiquarianism and the Visual Histories of Louis XIV: Artifacts for a Future Past.* Surrey, UK; Burlington, USA: Ashgate, 2015.

三、論文

方匀，〈明安圖研究〉，《內蒙古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1993 年第 3 期（科學史增刊），頁 44-47。

史筠，〈明安圖在欽天監五十餘年工作記略〉，《內蒙古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63 年第 1 期，頁 89-101。

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卷 22 期 2，2004 年冬季，頁 133-203。

吳美鳳，〈假作眞時眞亦假：從養心殿造辦處活計檔看盛清時期清宮用物之「造假」〉，收入王爾敏教授八秩嵩壽榮慶學術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史學與史識：王爾敏教授八秩嵩壽榮慶學術論文集》，中和：廣文書局，2009，頁 215-270。

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卷 30 期 1，2012 年 9 月，頁 55-85。

林士鉉，〈契約文書中的滿漢合璧印章：以《宜蘭古文書》爲例〉，《政大史粹》，期 4，2002 年 7 月，頁 1-20。

林士鉉，〈皇矣陪都，實則帝鄉：乾隆皇帝與滿、漢文《御製盛京賦》〉，《故宮文物月刊》，期 367，2013 年 10 月，頁 53-67。

林士鉉，〈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典藏滿漢文篆字《御製盛京賦》版本探究〉，收入白文煜主編，《清前歷史與盛京文化（清前史研究中心成立暨紀念盛京定名 380 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卷）》，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5，頁 373-388。

侯怡利，〈洞天日月多佳景——乾隆時期鏡匣的製作〉，收入吳曉筠主編，《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304-319。

侯怡利，〈匣中的祕密花園——談乾隆時期冊匣類文物包裝〉，《故宮文物月刊》，期 396，2016 年 3 月，頁 94-104。

侯德仁，〈乾隆年間新疆地區的輿圖測繪〉，《文史知識》，2008 年第 8 期，頁 27-32。

苑洪琪，〈清宮大典與午門儀仗〉，《紫禁城》，2005 年第 3 期，頁 136-145。

孫喆，〈乾隆《內府輿圖》上疆域的變化〉，《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140-164。

秦國經、劉若芳，〈清朝輿圖的繪製與管理〉，《中國古代地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清代卷，頁 71-78。

許明龍、韓琦，〈康熙的洋欽差——白晉〉，收入許明龍主編，《中西文化交流先驅》，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頁 174-189。

康無爲（Harold Kahn），〈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與異國奇珍〉，《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37-72。

劉潞，〈一部規範清代社會成員行爲的圖譜——有關《皇朝禮器圖式》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 年第 4 期，頁 130-161。

劉燕、穆淵，〈試論清代新疆銅錢〉，《新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30 期 2，2002 年 6 月，頁 70-74。

潘勝強，〈清代古錢幣收藏與研究述略〉，《碑林集刊》，期 18，2012 年，頁 232-240。

潘勝強，〈清以前的錢幣學研究及其撰述簡論〉，《中國錢幣》，2013 年第 6 期，頁 16-23。

潘勝強，〈清代泉學典籍的繁興及其主要類型〉，《歷史文獻研究》，總期 32，2013 年，頁 284-293。

賴惠敏，〈十九世紀恰克圖貿易的俄羅斯紡織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9，2013 年 3 月，頁 1-46。

賴毓芝，〈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收藏的一些思考〉，《故宮文物月刊》，期 276，2006 年 3 月，頁 106-118。

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卷 29 期 2，2011 年冬季，頁 1-75。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2012 年 3 月，頁 1-76。

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爲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0，2013 年 6 月，頁 1-75。

羅文華，〈宮廷與西藏：乾隆時期藏佛教銅法物加工技術之選擇與引進〉，收入故宮博物院與柏林馬普學會科學史所編，《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221-276。

羅文華、文明，〈謎一樣的紫金琍瑪〉，《紫禁城》，2014 年第 5 期，頁 87-111。

Cohen, Monique. “A Poi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Books Presented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in Paris by Joachim Bouvet, S. J., in 1697.” *Chinese Culture, A Quarterly Review*, 31:4, pp. 39-48.

Lai, Yu-chih. “Costuming the Empire: A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of Tributary Paintings at the Qianlong Court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Lynda Klich and Tara Zanardi, eds., *Visual Typologies from the Early Modern to the Contemporary: Local Contexts and Global Practi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McCausland, Shane. “The Emperor’s Old Toys: Rethinking the Yongzheng (1723-35) *Scroll of Antiquiti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66 (2001-2002), pp. 65-75.

Mei, Yun-chiu.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Yu, Hui-chun.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Casting the Territory: A Study of Two Cabinets of Coins from the Qianlong Period in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in St. Petersburg

Lai Yu-chih*

Abstract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in St. Petersburg houses two cabinets of coins from East Turkesktan presented when the Qing empire conquered the territory in 1759. The museum asserts that these two cabinets were a diplomatic gift from Emperor Qianlong to Catherine the Great. The cabinets were both made of valuable Zitan wood and are covered with inscriptions in Chinese, Manchu, Mongolian, and Uighur scripts. Both cabinets contain three tiers of coins, 32 and 51 in total respectively, dating from 2 BCE to 12 CE. Scholarship on the coins themselves has neglected the circumstanced of their gifting. However, the archives of the Qing court allow us to reconstruct when, how, and even why Emperor Qianlong ordered the coins to be collected and displayed. This article situates the analysis of these two cabinets of ancient Chinese coins in the context of both Chinese and European numismatic traditions, and off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meanings of Qianlong's gift. Its visual and material aspects show Qianlong's understanding of European practices and his use of non-verbal forms to promote his political agenda.

Keywords: Qing Court Visual Culture, numismatic collection in the Qing Court, Qing East-Turkestan campaign, coinage reform in Xinjiang, Qing-Russia relations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